

#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亨通

##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第 79 期  
2011 年 1 月 31 日

\*\*\*\*\*

### 目 录

#### 【论 文】

- 苏联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 左凤荣
-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及其教训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体制的确立与影响 左凤荣
-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苏联解体 左凤荣

#### 【评 述】

- 2009 年国外社会学的族群研究回顾  
马戎, 马雪峰, 祖力亚提·司马义, 阳妙艳, 赵蕊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 【论 文】

# 苏联处理国内民族问题的经验教训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左凤荣

2010年12月27日，在俄联邦国务委员会与民族项目和人口政策的国家委员会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在谈到国家的民族政策时，梅德韦杰夫总统和普京总理就对苏联民族政策的看法产生了公开分歧。普京在谈到最近莫斯科发生的民族冲突事件时说，我们应该感到羞愧，“要知道在苏联时期没有这样的民族关系问题。苏维埃政权建立了各民族和教派间和平的基础。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没有这样的问题。我和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出生和成长在列宁格勒，在那里长大。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列宁格勒有过民族主义的表现。在莫斯科、在苏联其他地区也没有这样的事情。”他认为，原因首先在于“苏联政府建立了某种凌驾于民族和宗教关系之上的实体。遗憾的是，它带有意识形态性。这就是社会主义思想，他们甚至想出了某种新的人的共同体——苏联人民。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我们说‘俄国人’、‘俄国人民’<sup>1</sup>，但现在还没有变成现实。我们找不到像苏联所选择的那样的东西。我认为，我们没必要向遥远的过去寻找这种东西，如果有一种能代替过去不错做法的东西，那就是全俄爱国主义。我们只是没有利用它，没有发展这种思想，有时甚至还羞于提起它。这没什么可害羞的，应该为此感到骄傲，应该让每个人都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要让他们知道，国家的成功取决于每个人的成功，反之亦然。”梅德韦杰夫在随后的发言中明确表示不同意普京的看法，他说：“刚刚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提起苏联找到了在民族和平方面取得一定成绩的办法。那么能不能复制苏联时期的做法呢？我们大家都是很现实的人，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苏联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上的，坦率地说这是一个严厉的国家。现在的俄国是另一种国家，我们的问题和办法都与此相关。假设我们回到25年前，坦率地说，现在在这个大厅里的国家领导人不可能讨论这个问题。采用另外的手段在某些地方可能更有效，在某些地方则无效。在这个意义上苏联的命运给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最好的参考。”<sup>2</sup>此事再次说明当今的俄联邦民族问题依然严峻，民族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苏联的民族政策更值得深入研究，如果不能实事求是地总结其经验教训，会对现实产生消极影响。

## 一、俄国是世界上民族最复杂的国家，也是民族问题最多的国家

众所周知，扩张是沙皇俄国的主旋律，俄罗斯民族统一国家刚刚建立之时，其领土只有280万平方公里，是单一民族国家，经过历代沙皇的扩张，到20世纪初俄国已是一个横跨欧亚两大洲、濒临三大洋的帝国，其领土扩大了近2000万平方公里。到十月革命时，俄国境内有大大小小190多个民族。

沙皇政府对少数民族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只占总人口43%的俄罗斯族人，享有种种特权，广大非俄罗斯民族被当成“异族人”，政治上处于无权地位；经济上，少数民族地区变成了俄罗斯人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沙皇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提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皇帝、一个宗教、一种语言”的口号，禁止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强迫他们改信东正教。列宁把俄国称为“各族人民的监狱”，并认为“许多年来大俄罗斯人受着地主和资本家的影响，养成了一种丑恶可耻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偏见。”<sup>3</sup>

正是由于俄国积累了太多的民族矛盾，在二月革命后，俄罗斯帝国解体，许多民族建立了自

<sup>1</sup> 普京此处用的词是 *россияне, российский народ*，指的是生活在当今俄罗斯联邦的所有国民。

<sup>2</sup>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9913>

<sup>3</sup>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下同）第38卷，第48页。

己的独立国家。波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得到了苏俄政府的承认，俄罗斯帝国发生了第一次解体。

俄罗斯帝国给苏联留下了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苏联也成了世界上民族最多、民族问题最复杂的国家。在 70 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苏联的民族政策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许多问题，民族政策的失误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 二、列宁的民族理论与苏联的成立

列宁的民族理论是辩证的，他一方面强调被压迫民族有民族自决权，另一方面又强调历史发展的趋势是民族融合，共产党要为促进各民族的自愿联合而斗争。1915 年列宁写道：“我们要求民族有自决的自由，即独立的自由，即被压迫民族有分离的自由，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实行经济上的分裂，或想实现建立小国的理想，相反，是因为我们想建立大国，想使各民族接近乃至融合，但是这要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现；没有分离的自由，这是不可想象的。”<sup>1</sup>

与列宁的这一理论相适应，在国家体制的设计上，列宁强调集中制与地方自治和区域自治相结合，他说：“在各种不同的民族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情况下，并且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马克思主义者是决不会主张实行任何联邦制原则，也不会主张实行任何分权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大国是从中世纪的分散状态向将来全世界社会主义的统一迈出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一步，除了通过这样的国家（同资本主义紧密相联的）外，没有也不可能有别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sup>2</sup>列宁把广泛的自治看成是民主国家体制的重要原则，“必须实行广泛的区域自治和完全民主的地方自治，并且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居民民族成分等等的估计，确定地方自治地区和区域自治地区的区划。”<sup>3</sup>

在许多民族纷纷独立的背景下，列宁改变了反对实行联邦制的思想，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通过的《劳动者和被剥削民族权利宣言》中宣布：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实行联邦制，在真正民主基础上，实现各民族权利平等。列宁明确表示：“我们希望俄罗斯（我甚至想说大俄罗斯，因为这样更正确）人民的共和国能把其他民族吸引到自己方面来，但用什么方法呢？不是用暴力，而是完全靠自愿的协议。否则就要破坏各国工人的团结和兄弟般的联盟。”“‘自决’一词曾多次引起曲解，因此我改用了——一个十分确切的概念‘自由分离的权利’”，“我们尤其必须承认分离的自由，因为沙皇制度和俄罗斯资产阶级的压迫在邻近的民族里留下了对所有大俄罗斯人的极深的仇恨和不信任；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言论来消除这种不信任。”<sup>4</sup>

作为执政者的列宁并不希望俄国分裂为多个国家，但当时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实际上是平等的苏维埃国家，都有自己的行政建制——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有自己的军队和货币。在国内战争时期，在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各共和国通过与俄罗斯联邦签订双边条约的形式，结成同盟，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在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下，成立了联合的人民委员部（包括军事、财政、劳动、交通、邮电等），这些委员部在各共和国驻有全权代表。在这一背景下列宁主张承认少数民族的权力，建立联邦制国家。

在成立联盟国家的问题上，斯大林要求其他民族国家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遭到白俄罗斯、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的抵制。列宁反对斯大林用行政压制的办法解决问题，他强调在自愿的原则上建立新的联盟，办法是俄罗斯民族向少数民族做出让步。列宁强调要尊重少数民族共和国的权利，列宁认为，这个“自治化”方案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他

<sup>1</sup> 《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85 页。

<sup>2</sup> 《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148—149 页。

<sup>3</sup> 《列宁全集》第 24 卷，第 61 页。

<sup>4</sup> 《列宁全集》第 32 卷，第 369、370 页。

主张：“我们承认自己同乌克兰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以及其他共和国是平等的，将同他们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联盟，新的联邦。”“重要的是我们不去助长‘独立分子’，也不取消他们的独立性，而是再建一层新楼——平等的共和国联邦。”<sup>1</sup>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建立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其分歧的根本点在于：斯大林没有完全理解俄国民族问题的特殊复杂性，想用行政压制的办法解决问题，而列宁认为通向这一联盟的道路是自愿的，不能靠暴力，他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主张向少数民族让步。针对斯大林等人对格鲁吉亚粗暴的做法，认为要取得异族人的信任：“应该不仅表现在遵守形式上的民族平等，而且表现在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抵偿在生活中事实上形成的不平等。”<sup>2</sup>

列宁与斯大林的分歧还表现在国家体制上。斯大林坚持把苏联建成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列宁则主张建立名副其实的联邦制国家，强调尊重少数民族共和国的权利，他说：“在加入我们联盟的其他各民族共和国中使用民族语言这个方面应制定极严格的规章”，“这里要有一个详细的法典，这个法典只有居住在该共和国内的本民族的人才能够比较成功地拟定出来”。在苏联成立之际，列宁甚至做退回去的准备，“只在军事和外交方面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在其他方面恢复各个人民委员部的完全独立”。<sup>3</sup>列宁主张，不是靠强制，而是靠联盟内各成员国间的平等，靠联盟增进各民族的发展与进步，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当时正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政策主张是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让他们放开手脚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

1922年12月30日，苏联成立，并得到各民族的接受与认同，主要原因在于：虽然当时存在独立的民族国家，但这些国家都是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统一的；乌克兰等少数民族为能与大俄罗斯民族在联盟中拥有平等的权利而感到满足；各国面临着共同的来自资本主义方面的外部压力。

### 三、苏联在保持民族多样性、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

俄罗斯著名学者季什科夫认为：“苏联的文化和教育产品、保持民族多样性是20世纪人类最显著的成就之一。”这一看法是符合实际的。在7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苏联民族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各加盟共和国扫除了文盲，各类教育事业也迅速发展。据统计，1984—1985学年，在14个非俄罗斯民族共和国中有普通中小学6.84万所，在校学生2430万，占全苏54%；中等专业学校1924所，在校学生201.84万，占全苏45%，高等专业学校392所，在校学生223.89万，占全苏42%。外高加索和中亚地区8个加盟共和国每万名居民中拥有大学生数已超过英、法、德、意、日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sup>4</sup>

中亚的五个加盟共和国，在20世纪60—70年代，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接近或超过全苏平均水平，工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超过50%，已由昔日落后的农牧业地区变成工农业地区。民族地区普遍呈现都市化进程加快、工人和职员队伍扩大、脑力劳动者人数增加的情况，从事农牧业的人数明显减少。1979年农民在哈萨克斯坦所占比重仅为6.5%，农牧业人数最多的土库曼斯坦也只占33.4%。

民族融合的趋势也在发展，形成了许多由不同民族成员组成的家庭。据统计，不同民族成员组合成的家庭在1979年占家庭总数的14.9%，1989年占17.5%（在7710万家庭中合成家庭有1280万），如果加上这种家庭的双方父母家，其数目更大。用俄语作为交际语言的非俄罗斯族人在1926年是640万人，而到1989年已经达到1870万人。到1989年苏联有2.867亿人，其中俄罗斯族有1.452亿人（占50.6%）。在俄罗斯联邦1.474亿人中俄罗斯族占81.5%。81.4%的苏

<sup>1</sup>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13、214页。

<sup>2</sup> 《列宁选集》第4卷，第758页。

<sup>3</sup>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5页。

<sup>4</sup>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第1266页。

联居民，88%的俄罗斯联邦居民认为俄语是自己的民族语言并能熟练运用。<sup>1</sup>

#### 四、苏联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存在的问题

虽然苏联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严重问题。苏联民族政策的核心是在政治上支持作为联盟主体的俄罗斯民族，在物质上支持各民族共和国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苏联领导人教条主义地对待列宁的民族理论，他们一方面在理论上宣传民族自治，形式上成立了形形色色的按民族划分的行政实体；另一方面又不尊重这些民族实体的自治权利，坚决反对各民族共和国的政治诉求。理论与实际严重脱节，成为苏联民族问题产生与激化的重要原因。

##### （一）教条主义地奉行列宁的“民族自决权”，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民族自决政策具体体现在按民族划分行政区域，实行以主体民族冠名加盟共和国和行政区域，实行民族—国家联邦制上。这一政策在十月革命前后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把这一政策绝对化则带来了很多问题，并不利于国家的统一。

苏联成立时有四个成员：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联邦；1924年第一部苏联宪法颁布后，苏联开始重划民族区域，把斯摩棱斯克、维帖布斯克、戈梅利省等以白俄罗斯人为主的县从俄联邦划入白俄罗斯，使白俄罗斯面积增一倍，人口增两倍多。在乌克兰境内建立摩尔达维亚自治共和国。中亚原来有土耳其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花拉子模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和布哈拉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24年分割成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自治共和国（归乌兹别克）、卡拉-吉尔吉斯自治州（1925年改名吉尔吉斯自治州，加入俄联邦），哈萨克人多的地区并入哈萨克苏维埃自治共和国。1925年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1936年苏联宪法通过后，苏联的成员增至11个：三个斯拉夫国家、外高加索联邦一分为三，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宣布形成了新的社会主义民族。1940年8月波罗的海三国加入。苏芬战争后，苏联在新吞并的芬兰领土上于1940年3月建立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40年8月又把并入了比萨拉比亚的摩尔达维亚升格为加盟共和国。至此，苏联有16个加盟共和国。1956年7月卡累利阿—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变为自治共和国并入俄联邦。

各加盟共和国境内又按民族划分民族自治地区，俄罗斯联邦有：16个自治共和国、5个自治州、6个边疆区、49个州、10个自治区，冠有“自治”字样的都是以民族划分的。乌兹别克有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格鲁吉亚有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阿扎尔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州；阿塞拜疆有纳西切万自治共和国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塔吉克有戈尔诺巴达赫什自治州。苏联最终包括15个加盟共和国、20个自治共和国、8个自治州和10个民族自治区，共有53个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冠名民族在其构成体内都占有多数，如在哈萨克斯坦，到1981年其1505.3万人口中，哈萨克族有528.9万人，俄罗斯族则有599.1万人。据1989年的调查，在俄罗斯联邦16个民族自治共和国中，多数的冠名民族都不占多数。在5个民族自治州中，没有一个民族人口占多数的，如在犹太自治州犹太人只占4.2%，俄罗斯族人的比例高达83.2%。在10个民族自治区中，只有阿加布里亚特自治区、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的冠名民族的人口占了多数，其余都是俄罗斯人居多，超过半数。

这种以民族划分行政区域的体制，带来了三个严重的消极后果：

首先，没有建立起各民族间的平等关系，没被冠名的民族实际上感到不平等，而且为什么有的民族建立的是加盟共和国，有的却是自治共和国或者自治州，有的还没有建立自己民族构成体

<sup>1</sup> Барсенков А.С., Вдовин А.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38-2002.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 2003, С.307, С.308.

的权利，有的建了自治共和国后又撤了，没有明确的标准。苏联只有 60%的居民生活在冠名的民族自治实体中，主体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感觉处于一种不平等地位。

第二，人为制造民族区别，不利于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按民族划分区域、实行所谓自治的做法并没有达到使各民族相互接近和融为一体的目的，反而导致了少数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增强。这种做法使苏联居民首先认同的是自己的民族属性，然后才是国家属性。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民族地区的第一把手必须是来自主体民族的，不管此人是不是胜任，人们认同的首先是民族归属。勃列日涅夫促使干部本地化，大力提拔任用本民族的人担任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形成官官相护的民族干部帮派集团，俄国历史学家认为：“70年代有关地方干部的这个愚蠢的领导纲领给所有地方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国家所有地区民族主义逐渐地、但又明显地成长，而然后是走向民族冲突。”<sup>1</sup>1986年12月，戈尔巴乔夫解除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的职务，任命俄罗斯族人科尔宾接任，引发了大规模抗议。

第三，造成联邦体制的不对称，俄罗斯联邦无论是人口、面积、经济实力都居绝对优势，最后的结果是苏联只是名义上的联邦制国家。

第四，宪法与实际的矛盾，为民族分离提供了法律依据。随着斯大林体制模式的形成，苏联实际上是单一制国家，但在宪法上却是联邦制国家，每个加盟共和国都有除了军队和外交机构外的所有设置。1924、1936、1977年宪法中都明文规定各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联盟的权利，但没有具体细则，本没打算实行。但是，既然宪法规定了各民族国家有退出联盟的“自由”，为民族地区脱离联盟提供了法律依据。既然苏联宣称自己实现了民族平等，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就应该在宪法中强调国家的统一性，而不是分离的自由。苏联的实践表明，民族自决权被用于一国国内，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统一。

## （二）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并未真正尊重民族自治权

斯大林及其以后的领导人，把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存在。自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后，苏共便否认苏联存在民族问题，开始实行实质上的民族同化政策，鼓励异族通婚，提倡国际主义（族际主义），在语言文化上推行俄罗斯化政策等等，30年代哈萨克人通常使用的阿拉伯字母被拉丁字母所取代，后来又被基里尔字母所代替。纳扎尔巴耶夫深有体会地说：“苏联的民族政策是从俄罗斯帝国那里继承下来的。布尔什维克的所作所为不管用怎样响亮的意识形态口号来加以掩饰，他们总是在继续，时常以更残酷和反常的形式继续沙皇制度下开始做的事情。这个制度也好，那个制度也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对待民族边区方面都推行一种强硬的政策。无论是这个，还是那个制度，从来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注意地方居民的利益，对他们的所有抗议行动一律残酷地进行压制。”<sup>2</sup>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民族自我意识也在增长，对此，苏共不是尊重和引导，而是用大俄罗斯主义进行压制。

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苏联政府常常忽视民族地区的特殊性。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不顾各民族的意愿和经济发展水平，强行搞农业全盘集体化，给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等民族地区带来严重灾难。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许多人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帽子，大批少数民族干部被迫害致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斯大林对少数民族不信任，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把居住在苏联西部的3万多波兰人、居住在远东的10多万朝鲜人、居住在伏尔加河流域的100多万日耳曼人等，从他们的居住地强行迁至中亚和西伯利亚。二战后期，斯大林认为某些少数民族有人与德国占领者合作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背叛”，把他们全体迁移到其他地区。1943年12月从高加索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迁走印古什人和车臣人，3月迁走巴尔卡尔人，5月迁走克里米亚鞑靼人，6月克里米亚的希腊人被从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11月格鲁吉亚的马斯赫特土耳其人与赫姆辛人被迁移。许多人在迁移途中死亡。1940年8月苏联强行把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自

<sup>1</sup>（俄）阿科波夫等著：《1953—1996年俄国史》，莫斯科1997年，第288页。

<sup>2</sup>（哈）努·纳扎尔巴耶夫著，陆兵、王沛译，《时代、命运、个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130页。

己的版图，随后，又强迫数十万人迁往苏联内地，把大批俄罗斯人迁入这一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所谓自治实体得不到尊重，没有什么权利可言，“被惩罚民族”的民族政权同时被撤销。虽然后来为这些受迫害的民族恢复了名誉，也恢复了某些民族自治实体，但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这些民族问题的后遗症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

中央集权制不断加强。苏联成立时，全联盟和联盟兼共和国的部级机关只有 10 个，到 1947 年，部长会议下设的部已达到 58 个，到 1982 年，苏联有 33 个全联盟的部和 31 个联盟兼共和国的部，6 个全苏国家委员会和 14 个联盟兼共和国的国家委员会，总计 84 个。再加上其他中央直属机关 26 个，总数已达 110 个。在这样庞大的行政机构下，各加盟共和国根本就没有自主权，它们支配的工业产品还不到全苏工业总产值的 10%。土库曼斯坦总统尼亚佐夫曾说过：“我们的国家在苏联时曾得到许多东西，首先是在教育方面，但土库曼斯坦从来不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平等的一员。不管对我们下达什么命令，我们都必须完成。……土库曼斯坦不能根据自己的倡议独立地解决任何问题。”“在土库曼斯坦谁都不知道销售 700 亿立方米天然气、1500 万吨石油、50 多万吨棉花的利润究竟用在何处。与此同时，共和国一直置身于落后者的行列，我们实际上完全没有正常的经济基础设施，也没有加工工业部门。”<sup>1</sup>赫鲁晓夫时期曾经搞权力下放，受到各共和国的欢迎，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重又加强中央集权。

### （三）实行扶植少数民族地区的“拉平”政策，两边不讨好

苏共并没有用共同的经济利益、共同的经济空间把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苏联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用行政手段管理国家，人为地在全国搞劳动分工，常常违反经济发展规律，如乌兹别克生产棉花，自己却不能生产棉布；土库曼斯坦产天然气，这里 90% 的居民用不上天然气；哈萨克斯坦是畜牧业基地，肉的供应却很紧张。中央的计划经济使中亚国家向单一经济发展，把哈萨克斯坦适宜种棉花的土地划给乌兹别克，又把乌兹别克适宜种粮食的土地划给哈萨克斯坦，把乌兹别克适宜放牧的土地划给塔吉克斯坦。

为了消除民族地区的不满，勃列日涅夫在经济上加大向民族地区倾斜的力度，实行低水平的“拉平”政策，让发达地区支持不发达地区。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速度明显高于发达地区，1980 年全联盟工业总产值比 1965 年增加 168%，其中俄罗斯增加了 158%，白俄罗斯增加了 318%，格鲁吉亚增加了 195%，阿塞拜疆增加了 204%，立陶宛增加了 225%，摩尔达维亚增加了 220%，吉尔吉斯增加了 253%，塔吉克斯坦增加了 265%。这种企图在短时间内实现拉平的政策既助长了一些落后民族的依赖心理，也引起了一些发达民族的不满，反而助长了民族意识，加剧了民族矛盾和中央与地方间的矛盾。俄罗斯人觉得他们成了“奶牛”，认为自己长期帮助落后地区，处于不平等地位，导致俄罗斯民族主义兴起，他们要甩掉包袱；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都认为联盟使它们落后了，对俄罗斯人不满。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做法使多数和少数民族都对联盟不满，增强了疏离感，一旦政治高压消失，联盟很难维系。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起了急先锋的作用，认为自己利益得不到保障而谋求独立的俄罗斯联邦则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 （四）未能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

苏联长期片面执行列宁所提出的压迫民族，即大民族要处于不平等地位，以补偿在生活中形成的事实上不平等的做法，导致了新的民族不平等。少数民族享受许多优惠政策，在教育方面，少数民族地区确实得到了很大发展。据 1990 年的统计，在每千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摩尔多瓦人是 125，车臣人是 151，乌克兰人是 163，阿塞拜疆人是 172，拉脱维亚人是 182，吉尔吉斯人是 188，俄罗斯人是 190，亚美尼亚人是 207，立陶宛人是 208，爱沙尼亚人是 213，哈萨克人是 230，格鲁吉亚人是 274，俄罗斯人的受教育水平并不高。在苏联解体的过程中，俄罗斯的民族主义之所以迅速发展，并要求独立，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联盟并不代表其利益，一些俄罗斯人并没有把苏联看成是自己的民族国家，而俄罗斯要独立，苏联就不可能存在了。如果说在

<sup>1</sup>（土库曼斯坦）萨·尼亚佐夫，《永久中立 世代安宁》，赵常庆等译，东方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54、155 页。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的大民族对小民族的“补偿”理论有一定道理的话，那么在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以后，应该有所改变和调整。

苏共在文化领域推行具有俄罗斯化色彩的政策，必须以俄罗斯为中心阐述苏联的历史，把沙俄当年的侵略扩张说成是“进步”，是应少数民族的“请求”，把扩张有功的俄军将领奉为“英雄”，而不许少数民族歌颂本民族的英雄等，否则被说成是“民族主义表现”。这些做法引起包括一些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

## 五、民族问题的总爆发与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在处理苏联民族问题上的失误和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发展，使苏联在改革过程中没有解决民族问题，民族问题的总爆发打断了改革的进程，也摧毁了联盟大厦。

### （一）没有认识到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

改革之初，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注意到民族问题，他一如既往地宣布：“民族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革命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社会经济上为民族平等铺平了道路，为拉齐所有共和国、所有区域和所有民族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水平做了特别多的工作。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是十月革命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在民族问题上首先敲响警钟的是1986年3-4月间发生在雅库茨克大学一批俄罗斯族青年和雅库特族大学生之间的冲突。接着是阿拉木图事件。从1987年开始，民族运动具有了有组织的特点，被迫害的鞑靼人要求返回克里米亚、纳一卡地区的归属、第比利斯事件、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风潮等等，让戈尔巴乔夫应接不暇。

### （二）革新联盟过晚，错过了良好时机

苏联的解体虽然表现为民族的分离，实质上并非完全因为民族问题，主要还是因为中央过分集权，地方权力不够。如果戈尔巴乔夫能够及时更新联盟，合理划分联盟中央与地方的权限，问题不会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在人民代表的选举中，民族主义成了合理的要求。戈尔巴乔夫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地方民族分离主义恶性发展，联盟中央被架空，联盟国家便走向解体。

### （三）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是促使联盟解体的重要因素

俄罗斯联邦是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面积约1700多万平方公里，占苏联的76.3%；人口1.48亿，占苏联的51.3%。该共和国拥有苏联63%的固定资产，其社会总产值和工业产值约占苏联的60%，农业产值占47%，人口、面积、经济实力都占苏联的第一位。俄罗斯联邦在叶利钦的领导下，一方面对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推波助澜，另一方面又与联盟中央争权，让戈尔巴乔夫一次次挽救联盟的努力落空。1990年5月，叶利钦当上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主席，6月12日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提出“俄罗斯法律至高无上”，其他加盟共和国群起效尤，开启了“主权大检阅”。

正是由于俄罗斯联邦的阻挠，戈尔巴乔夫策划的签署《新联盟条约》的工作一再受阻。1991年“8.19事件”后，由于统一的苏共已不存在，维系统一国家的纽带被剪断，戈尔巴乔夫丧失了影响共和国的最后手段，叶利钦趁机把联盟机构收归俄罗斯联邦所有，率先承认乌克兰独立。12月8日，叶利钦与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三个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明斯克签署了关于成立“独联体”的协议，最终从形式上打破了“苏联”这个外壳，苏联这个泱泱大国从此成为历史。

苏联解体的悲剧昭示我们：

1、培养对统一国家认同感十分重要。“在一个人口文化成分复杂的国家里，保证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和强大，首先要通过建立和宣传国家的象征，强化全体公民珍惜国家政权和对国家政权的忠诚感。”<sup>1</sup>把维护国家统一建立在法律基础上，避免出现理论与实际的脱节。

<sup>1</sup>（俄）B.A.季什科夫著，高永久等译，《民族政治学论集》，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2、应该把民族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团结的基础上，淡化民族意识的宣传，不要强化民族特征和强化民族差别。俄罗斯联邦从苏联吸取了教训，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中规定，俄罗斯继续奉行公民平等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为了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俄罗斯联邦用地方自治代替民族自治（尽管保留了原来以民族冠名的行政区，但其政权组成和运行方式与其他行政区无异）、用地区优惠代替民族优惠。限制因民族歧视而导致的地方民族主义和违反人权的行为，各共和国决定自己的经济、政治和语言文化生活，但共和国的国家体制不属于某个民族，共和国是相应区域内所有公民的共和国。废除了 1934 年开始的在证件上登记居民民族成分的做法，证件只有证明国籍的使命。

3、要科学地界定民族的概念。苏联以往的民族概念也源于西方，把所有民族都上升到政治民族的地位，是不科学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民族政策构想》在称呼国内各民族时没有用“нация”，而用“народы”等其他表示民族共同性和血统关系的词语。在 2010 年 12 月 27 日梅德韦杰夫总统说：“我们确实需要制定出新的办法，尽管在提到新的苏维埃共同体，人民的时候我们有时会发笑，事实上，这种思想是绝对正确的。问题是这一构成，这样的共同体不是空谈出来的，也不取决于总统或者总书记的意志。这是几十年艰苦地做社会工作的结果。我们可以回想一下，40 年前美国还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现在已经完全是一个包容的社会。我们不要不好意思学习。俄国民族（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я）的想法绝对是有效的，没必要羞于提起它。”<sup>1</sup>实际上他提出了一个塑造国家民族的问题。“民族自决权”也不再包含有政治独立的意味，而被解释为：保证公民和民族文化同一体选择自主文化发展权力的形式、政治管理的形式，实现自决有两种形式：区域构成和民族文化自治，排除了政治独立的可能性。

## 【论 文】

# 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及其教训

##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体制的确立与影响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左凤荣

**内容提要：**苏联问题的根子在政治体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苏联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苏联改革政治体制的核心是解决公民与政权分离的问题，消除经济改革的障碍机制，为此，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列宁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为目标，试图通过全民选举苏维埃代表来实现公民与政权的结合，但实践的结果证明此路不通。本文分析了“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行不通的原因和造成的严重后果，总结了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教训。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 政治体制改革 苏维埃 苏联人民代表大会

斯大林模式下的政治体制弊端越来越明显，改革这一体制，实现政治的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对于苏联而言，我认为其主要应该是改变原来体制中的国家政权与人民分离、官员与普通民众权利不对称的现实，实现人民的国家由人民管理的目标。但是，戈尔巴乔夫实行的以“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为目标的改革，并进行了全民选举人民代表的工作，实际上并未能真正克服人民与政权分离的问题，这一方针选择犯了战略性错误。

<sup>1</sup> <http://www.kremlin.ru/transcripts/9913>

## 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不符合现代政治发展的规律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就提出了改革政治体制的问题，到1988年时，由于经济状况一天天恶化，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问题自然被提了出来。“‘加速战略’的破产明显地表明，问题堆积如山的根源在于体制本身，而不在于这种体制的一些工作机制。”<sup>1</sup>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在少数。从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开始，戈尔巴乔夫把民主化、公开性和政治改革提到首位，开始转向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许多苏共高级领导人的共识，雷日科夫认为：“党的领导核心已经逐渐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下去不行！——这句话后来也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情况下，原先那种畸形的政治体制成了拦路虎，使人生畏，尤其是使我们这些经济学家和实业家生畏。我们很清楚，党的高层领导对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既没有彻底理解，也没有接受。党（主要指高层领导）一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又不对全国发生的大事负任何责任。合法的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以及各级地方苏维埃则徒有虚名，什么事也解决不了。选举制度越来越成为一种摆设。”<sup>2</sup>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也认为：苏联的“社会政治体制显得有点太受条条框框的约束，它的巨大潜力丧失自我发挥、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能力。社会主义，作为本质上最需要发扬民主、同时也需要讲法制的社会，却没有使这两方面和谐地结合和有机地统一起来。”<sup>3</sup>在1988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时，苏共中央就达成了共识，即改革不是改善现有的体制，而是使这个体制有崭新的结构和成分，赋予它新的内容和活力，也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戈尔巴乔夫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共有七个方面：让千百万劳动人民真正参与国家的管理；为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治过程开辟最大的空间，为充分发挥公民、权力代表机关、党组织和社会组织、劳动集体的主动性创造条件；自由形成和表现各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意志，他们商定和实现苏维埃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为各大小民族的进一步自由发展、在族际主义原则上加强他们的友好和平等合作保障条件；根本加强社会主义法律和法治；明确区分党政部门的职能；建立有效的机制，以保障政治体制能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自我革新，而政治体制要能在一切生活领域越来越积极地发展和实行社会主义民主与自治原则。<sup>4</sup>戈尔巴乔夫强调多一些民主，多一些社会主义，使劳动者过上美好生活，国家强盛。戈尔巴乔夫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强调“我们在社会制度的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哲学的根据是《共产党宣言》的著名公式：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sup>5</sup>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在个人的社会权利方面，虽然也存在一些不足，但总的情况较好；而在关于人的政治权利方面做得不好，没有克服人与政权、与政治疏远的状况，应该通过改革吸收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应该提供对任何问题发展自己意见机会的政治自由。“改革的核心是让人作为主角回到政治进程中去，回到经济中去，回到社会精神领域的发展中去。把业已开始的为克服使人失去生产资料、失去权力、失去文化的变革工作继续下去并进行到底。”<sup>6</sup>但人民长期没有政治民主的训练，一步到位由民众来

<sup>1</sup> (俄)亚·尼·雅科夫列夫著，徐葵等译，《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页。

<sup>2</sup> (俄)尼古拉·雷日科夫著，高洪山、韩生民等译，《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9页。

<sup>3</sup> (俄)克留奇科夫著，何希泉等译，《个人档案（1941—1994）——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736页。

<sup>4</sup> Горбачев М.С. Избра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6.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 С.353-354.

<sup>5</sup> Горбачев М.С. Избранные речи и статьи. Т6.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9. С.354.

<sup>6</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述弢等译，《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7页。

决定一切显然是不现实的。

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的具体任务是完善权力结构，核心是恢复苏维埃的职能，恢复列宁时代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则，任何一个问题，无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问题，不能越过苏维埃加以解决，党的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民族政策——都应当首先经过人民代表苏维埃这个人民政权机构来执行。“政治改革的实质是明确划分党的机关和苏维埃的职权，把权力从共产党的手中转到苏维埃的手中。”<sup>1</sup>大多数代表支持戈尔巴乔夫的主张，但这种把一切权力从党又全部转向苏维埃的做法，显然很片面。现代政治体制的原则的是分权与制衡，在现代政治中，立法和行政、司法是各自独立、各有分工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做法显然是不妥的，党集中了一切权力有弊端，苏维埃也不能集中一切权力。此外，最高苏维埃不是直接由民众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人民代表选举的，仍是间接产生的，人民并不能直接监督他们，他们也不能直接反映民意。

## 二、苏维埃本身的制度设计有缺陷

1988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通过的苏联宪法修正案规定，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是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其任期为5年，一年召开两次例会，享有国家全部权力：通过和修改苏联宪法，确定国家结构、苏联国界和批准各共和国之间的疆界变更，确定国家的内外政策方针，批准国家计划和发展纲领，选举最高苏维埃成员等。

苏联最高苏维埃，是苏联国家权力常设的立法、管理和监督机构，由人代会选举产生，成员为544人。仍由两院：联盟院和民族院组成，各有代表271人。普里马科夫院士被选为联盟院主席；乌兹别克斯坦国务活动家拉·尼沙诺夫为民族院主席。最高苏维埃享有立法权，规定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任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批准政府组成人员，任命最高法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苏联总检察长等重要公职人员。苏联最高苏维埃成立14个专门委员会，涉及国家内政外交各个方面，联盟院和民族院下共设置了8个委员会，这样苏联最高苏维埃总共有22个委员会。法律规定这些委员会享有重要职权：一切国家机关和社会机关、组织和公职人员必须完成这两类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向他们提供必要的资料 and 文件。

苏联最高苏维埃每年有1/5的成员要更新，也就是说在5年任期内全部轮换完，最高苏维埃成员的这种非常任性与其承担的无限职能显然是不相称的，破坏了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这种做法极不科学。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不再像以前那样由最高苏维埃选举产生，而是由国家的高级公职人员组成，他们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第一副主席、15名副主席（即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联盟院和民族院的主席、苏联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两院常设委员会主席组成。它没有权力通过法律，其主要权限是：召集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筹备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会议、协调两院常设委员会和最高苏维埃委员会的活动、协助苏联人民代表行使其职权并保障他们的必要信息，监督苏联宪法的执行并保障各加盟共和国宪法和法律与苏联宪法和法律的一致性、筹备和组织进行全民投票和公决以及全民讨论苏联法律草案和国家生活的其他重要问题。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实际上是国家元首，它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从人民代表中通过无记名投票产生，任期5年。其职权是领导研究应由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审议的问题；签署苏联法令，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提出关于苏联国内状况和苏联国内外政策重要问题以及保障苏联国防能力和安全的报告。需要由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选举或批准的国家重要领导人的人选由最高苏维埃主席提出候选人。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政治体制改革中，苏联原来体制中缺少制约和监督的问题并没有解

---

<sup>1</sup> Орлов А. С., Георгиев В. А., Георгиева Н. Г., Сивохина Т. 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Учебник.—2-е изд., М.: ТК Велби, Изд-во Проспект, 2003, С.453.

决。戈尔巴乔夫提出，党要把不属于它的那些权力和职能统统归还给国家政权机关，即实现权力中心从党的机关向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转移。但是，戈尔巴乔夫要“用党的威信来加强作为人民代表机关的苏维埃的作用”，其办法是把同级常委会的第一书记推荐到苏维埃主席的岗位上。戈尔巴乔夫兼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在自己的手中集中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样做的结果是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陷于繁杂的议会事务中，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放在最高苏维埃方面，党的决策体系被架空和削弱。苏维埃取代苏共成了新的立法与行政合一的机构，这与原来的体制并无大的区别。苏维埃成了无所不管的职能部门，内设了五花八门的委员会，极大地制约了行政权力，使许多问题议而不决，难以达成一致。1989年5月25日，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大会是实现“还权于苏维埃”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组建最高苏维埃领导机构，启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代表大会实际上变成了真正的群众大会，代表大会上集合了各种各样的人，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观点，2200多名代表各抒己见，发表议论、大喊大叫。总理雷日科夫不理解：“为什么最高苏维埃的成员们包揽了那么多权力，居然能研究和决定所有问题——从法律的制定，到国民经济的管理，一会儿行使政府职能，一会儿又行使立法职能。我同样不明白，为什么最高苏维埃几乎完全模仿苏共中央的机构设置来设立内部的部门和机构，只不过不叫部或局，而是叫委员会。这些机构所发挥的作用比党的机构更积极，更富有热情。他们使用的也是行政命令手段，而且往往更强硬。遗憾的是，他们的工作远不是那么在行。”<sup>1</sup>

尽管戈尔巴乔夫把选举产生的苏维埃看成是最高权力机关，设想“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实质上它只能履行立法机关的职能，人数众多的苏维埃是一个无效率的机构，其内部分歧严重，难以做出建设性决定，不可能有效领导国家。在最高苏维埃的活动开始后，戈尔巴乔夫也体会到了这一点，“批准雷日科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职，演变成了一场就经济战略问题展开的长时间的很有内容的辩论。”“与此同时，开始了对政府组成的漫长的马拉松式的讨论。先讨论的是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人选，有：马斯柳科夫、沃罗宁、阿巴尔金、比留科娃、古雪夫、多古日耶夫、卡缅采夫、拉韦罗夫。随后，谢瓦尔德纳泽公布了一张长长的各部部长、检察院、最高法院各院务委员会委员，以及其他苏联最高苏维埃所属各部门的高级负责人员的名单。”“这项议程从6月底一直延续到8月的最后几天，坦率地说，真把大家弄得精疲力竭。雷日科夫在政治局里抱怨，说他根本无法办公，不得不日复一日地干坐在议会的会议上。”<sup>2</sup>由于代表都是兼职，许多人同时是各部门和各地区的主要负责人，要求他们把几个月的时间用在开人民代表大会上，自然会影响行政工作。实践证明，戈尔巴乔夫这种大民主并没有起到促进改革的作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之后，改革开始滑坡，而且呈现出不可逆转的形势，它的标志完全是破坏性的。”<sup>3</sup>

苏维埃是选举产生的机关，而且其代表要经差额选举产生，这就有可能使非共产党人当选代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事实上意味着在政治上取消了宪法第六条。十月革命时期列宁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也是承认多党制的。戈尔巴乔夫要效仿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苏维埃，使它集立法、管理和监督于一身，这是一种“议行合一”体制。由于苏维埃组成的复杂性和人数众多，难以形成共识，造成了改革没有领导核心。最高苏维埃也没有制定出对社会至关重要的法律，没有严格的计划。因此，到1990年苏联不得不转向总统制。

### 三、人民代表的选举成为清算苏共错误和混乱的开始

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由2250名代表组成，其的产生方式是：750名代

<sup>1</sup> (俄)尼古拉·雷日科夫著，《背叛的历史——苏联改革秘录》，第246页。

<sup>2</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戈尔巴乔夫回忆录》上册，第548、549页。

<sup>3</sup> (俄)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张达楠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页。

表从地区选区选举；750名代表从民族地区选举（每个加盟共和国32名，每个自治共和国11名，每个自治州5名，每个自治区1名）；750名来自全苏的社会团体（苏共推荐100人，代表1900万党员；共青团推荐100人代表2600万团员；工会推荐100人代表工会会员），也就是说2/3的代表在居民中通过差额选举产生，1/3的代表由社会组织推荐。与以往徒具形式的选举相比，这是一大进步，但是这种做法仍然存在许多缺点。有1/3的代表不是选举，而是来自于社会组织。规定要选举数目如此众多的人民代表也缺乏根据，为什么是2250名而不是别的数字？如此众多的人民代表难以形成共识，这显然继承了苏共代表大会的传统，代表们与其说来开会，不如说更像来参加庆典。

1989年3月从上到下进行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这次人民代表选举同以往的选举相比有两个根本变化：其一，当选的人民代表将拥有独立的政治权力。其二，摈弃了由上级指定候选人进行等额选举的方法，规定实行不受限制的差额选举。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差额竞选人民代表的活动刚刚拉开帷幕，就吸引了社会各阶层人士以前所未有的热情积极参与。一方面，参加竞选的不仅有共产党人，而且有主张激进改革的“民主派”及其他形形色色观点的人士；另一方面，选民拥有在代表不同政治观点的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利。因而，竞选实际上成为各种经济、政治改革主张的竞争，成为在各种经济、政治改革路线中进行选择。从当时的政治力量看，尽管参与竞选者形形色色，但竞争和选择主要在苏共和“民主派”之间展开。当选者除“在册权贵”外，主要是激进派和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的竞选口号主要是号召“建立民主的社会、实现社会公正、有保障、清洁环境等等。在许多情况下，这样的候选人都在选举中战胜了‘官方’的竞争者，这反映了政权的严重危机<sup>1</sup>。在俄罗斯联邦有232人参与竞选，结果有78%的高层领导在选举中落选，有47%的中层领导落选，相反，有72%的知识分子却在这场选举中获胜。<sup>2</sup>在俄罗斯的645名代表中，知识分子占28%，党和政府官员占21%，工人占16%，企业管理人员占14%，农民领袖占13%，农民占8%。而在城市地区知识分子占当选代表的37%<sup>1</sup>。

根据新选举法规定的竞选程序，首先要在基层单位进行人民代表候选人的提名，通过竞选决出选区人民代表候选人提名，再通过竞选决出选区人民代表候选人，而后这些候选人正式参加人民代表的差额选举。由于提名候选人往往超过规定候选人人数一倍至数倍，决胜者须过五关斩六将，竞争极为激烈。但是，苏共推荐的100名代表是在1989年3月15—16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确定的，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等苏共高级领导人。在选举人民代表时苏共领导层实际上开始形成界限分明的两派，有59票反对雅科夫列夫（47票反对乌里扬诺夫），这些投反对票的人无疑属于党的保守派的核心；反对利加乔夫的有78票，这些反对利加乔夫的人是苏共中央赞成改革的部分。由各社会组织选举750名人民代表的做法受到攻击，许多人认为他们是“非人民选举”的代表，是人代会中的保守派，事实并非如此，其中有很多是很有社会威望的人，也包括反对派人士，其中有：萨哈罗夫、利哈乔夫、扎雷金、拉夫罗夫、格拉宁、波波夫等。

仍是苏共党员的叶利钦在选举过程中公开批评苏共，向苏共提出挑战。面对苏共内部对立的状况，苏共中央并没有很好地研究和采取对策，戈尔巴乔夫声明他还需要对这些问题进一步思考，1989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最后建议建立由苏共中央委员组成的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并向苏共中央非常全会提出自己的结论。戈尔巴乔夫点名让梅德韦杰夫（有可能的话作为主席）、拉祖莫夫斯基、普戈、扎特沃尔尼茨基等人组成这个委员会，但决议未被全体人员所采纳，委员会的最

<sup>1</sup> Козодой В.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ппозицион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Сибири(1989—август 1991г.)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8. №5. С.82.

<sup>2</sup> (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曹荣湘等译，《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页。

后确定是在几天以后，但没有公布。“委员会最后完成了其任务，其成员详细研究了叶利钦发表的许多讲话并形成了一个不长的文件（4 页纸），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尽管有一些主观的评价，但总体上这些讲话与选举前党的宣言、党的政治路线不矛盾。”<sup>2</sup>叶利钦成了让戈尔巴乔夫等人头疼的人物，在 1989 年 5 月 20 日，即苏联第一次人代会前夕，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人代会前政治局局势时，专门讨论了叶利钦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提出要不要跟叶利钦进行一次电话交谈，雷日科夫强调不要跟他发生对抗，利加乔夫表示要在本次或下次中央全会上反对叶利钦。梅德韦杰夫也反对对抗，强调不能再犯以前的错误。扎伊科夫反对这么做，提出应该给叶利钦工作。切布里科夫也反对跟叶利钦对抗。谢瓦尔德纳泽认为现在没必要与叶利钦直接接触。最后戈尔巴乔夫让拉祖莫夫斯基和弗拉索夫跟叶利钦见一面，并建议他担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如果叶利钦要求就说，中央委员会没想“摆脱”叶利钦。<sup>3</sup>

戈尔巴乔夫想通过人民代表的选举使共产党通过选举重新获得人民的认同，希望通过差额竞选吸纳社会上支持“改革”的力量进入政权机关。但选举证明社会上潜藏着对苏共极大的不满，这次选举有三个现象值得注意：

首先，在当选代表中，知识分子占到了 20%，有 88.1%的代表是首次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缺少从政的经验。

第二，参加竞选的党员干部，约有 20%落选，有 30 名左右的苏共州委书记与市委书记未能当选，莫斯科市长塞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落选，在列宁格勒州，州委第一书记索洛维耶夫、市委第一书记格拉希莫夫都未被选上，州第二书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市委主席全部落马。

第三，苏共的失败不仅表现在一批高中级干部落选上，更重要的在于一批激进民主派代表进入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叶利钦没有被列入苏共的 100 名候选人中，他面临抉择：继续当部长还是竞选人民代表，不甘放弃政治前途的叶利钦选择了后者。党不要人民要，叶利钦成了莫斯科人的偶像，在选举时他得了破纪录的 90% 的选票。<sup>4</sup>在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一些持激进纲领的候选人，如索布恰克、勃尔德列夫、伊万诺夫、德尼索夫等当选。丘拜斯在谈到 1988 年列宁格勒的选举时说：“民主派在彼得堡选举中的胜利让人震惊。民主派击败了党的州委的第一、第二及第三书记！击败了党的市委第一、第二书记！总之，他们击败了所有共产党员。”<sup>5</sup>新当选的人民代表、时任苏联科学院东欧问题研究所所长奥·博格莫洛夫在与自己选区一位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竞选中获得了 60% 的选票，他感慨地说：“我没想到与共产党竞选竟有这么大的优势！”美国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在其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了选举以后民众心态的变化：“有为数不少甚为独断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大选中惨败，……它传给广大公众信息是，只要你认真尝试，你就能够在选举中击败官方提名的候选人。……突然间，人们不再惧怕直抒胸臆了。”“似乎是一夜之间，每个人都开始对共产党的统治进行最毫不留情的抨击。”<sup>6</sup>叶利钦当选为人民代表，不仅为自己在政治上平了反，而且也使他成了能向戈尔巴乔夫直接提出挑战的人物。他与苏共逐渐拉开了距离，成了反对派的领袖，苏共的历史也因此发生了巨大转折。

---

<sup>1</sup> (美)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著，《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 134 页。

<sup>2</sup> *Медведев В.А. В команде Горбачева: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 М.: Былина, 1994.  
[www.lib.ru/MEMUARY/GORBACHEV/medvedev.txt](http://www.lib.ru/MEMUARY/GORBACHEV/medvedev.txt)

<sup>3</sup> «В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записям Анатолия Черняева, Вадима Медведева, Георгия Шахназарова (1985 – 1991)», 2-е изд., исправ. и доп. М.: Горбачев-Фонд, 2008. С.495—496.

<sup>4</sup> *В.В.Согриш.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1985—2001: от Горбачёва до Путина).*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есь Мир», 2001. С.50.

<sup>5</sup> (俄) 阿纳托利·丘拜斯主编，乔木森等译，《俄罗斯式的私有化》，新华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 页。

<sup>6</sup> (美) 小杰克·F·马特洛克著，《苏联解体亲历记》上卷，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45、251 页。

## 四、几点教训

戈尔巴乔夫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成功，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苏联不需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苏联问题的根源在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是改革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行事匆忙，教条主义地对待列宁，不顾现代政治的发展规律，盲目回归“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事实证明行不通。其教训是深刻的：

1、改革没有从基层做起。在19世纪后半期，俄国本来已开始了地方自治改革，十月革命打断了这一进程。戈尔巴乔夫提出要发展人民自治，但他并没有着手做，搞了全国规模的人民代表竞选。即便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能代表选民，但他在2200多名代表中能起多大作用令人怀疑，人民与政权分离的状况实际上并没有得到解决。民主应该从关系民众切身利益之处着手。

2、现代政治是个分工明确的系统，在确定政治改革的目标时应该广泛吸取人类社会成功的经验。苏联在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时，幻想回到十月革命的理想状态去，他们并未认真研究过十月革命后苏联的体制，当时也没有解决党与苏维埃的关系，没有解决官僚主义和以权谋私的问题，立法和行政合一的体制为后来斯大林的个人专权提供了体制条件。虽然戈尔巴乔夫实现了苏联人民代表真正由选举产生，但仅此是不够的，分工不明，职责不清，必然导致混乱。局势的发展逼迫他们最后走上了总统制之路，人民代表大会重归其立法者的地位，但又出现了共和国民选的小总统们与中央抗衡的局面，最后小总统们把大总统的权力剥夺了，苏联也随之解体。

戈尔巴乔夫教条主义、理想化地把列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原则运用到苏联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现代社会是分工明确的复杂系统，苏维埃不可能承担一切全权，由苏维埃决定一切并没有改变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端，正如米格拉尼扬所说：“在我国政治体制中回复到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样的制度，只不过是对于我们过去历史的一种浪漫的崇敬罢了。”<sup>1</sup>

3、不能把党和人民代表大会对立起来。苏共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把权力从党转到苏维埃手里。改变党垄断一切，提高苏维埃的作用是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但两者的权力是不一样的，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

苏联的体制是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担负着领导国家的重任，决定国家的内外政策，部长会议、各个部及各地的党和苏维埃机构控制着国民经济。书记处每周二开会，一般由党的第二把手主持，讨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党的建设本身的问题，实际上起着第二部长会议的作用。它还有一项部长会议没有的职能，即撤换和任命干部。苏共中央政治局是苏共和整个国家的主要政治机构和中枢神经，国家内外政策的大政方针都是在政治局内决定的。政治局每周四上午开会，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和一些急需处理的问题。在党的各种会议上，讨论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党自身建设的问题，而是管理国家的问题。因此，苏共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党，而是管理国家的机构。戈尔巴乔夫把这个机构抛开，另建一套机构，这并不是明智的做法。“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上号召划分党和苏维埃的职能，说明他不了解政治局势，苏维埃在瘫痪了半个世纪之后，绝对不可能马上成为权力的继承者。”<sup>2</sup>实践也证明，在各级代表大会建立起来后，它并没有，也无法承担起领导国家的职责，代表大会成了辩论争吵的俱乐部。苏共需要改变领导国家的方式，从直接发布命令转到把党的方针政策上升到法律，指导人民实现当家作主，使管理者的权力来源于公民而不是上级组织的任命，接受公民的监督与制约。

4、必须对党自身进行改革。苏共本质上是一个听命于总书记的政党，这个权力巨大的机构应该建立在民主制的基础上。虽然从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起，苏共开始在干部选举、机构设置上进行了一些改革，但党内干部的选举仍然流于形式，党内高层领导思想也不统一，党对具体行政工作的干预并没有减少，雷日科夫、叶利钦因此与利加乔夫产生了尖锐矛盾。党的工作重心也没转移到争取民众和进行党的建设上，对于社会上对苏共的攻击没有还手之力，苏共纠正了

<sup>1</sup> (俄) 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著，徐葵等译，《俄罗斯现代化与公民社会》，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75页。

<sup>2</sup> *Оников Л.* КПСС: анатомия распада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аппарата ЦК. М.1996. С.83.

历史上的许多错误，本可以甩开包袱轻装前进，但他们并没有注意消除历史的负面影响，树立起苏共的新形象，最后为历史的错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总之，从传统、专制的政治体制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演进是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既需要有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作保障，更需要吸收人类社会的文明成果，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滞后，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需要吸收各方的智慧，靠少数人教条主义地拍脑袋决策肯定是行不通的。

## 【论 文】

#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与苏联解体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左凤荣

**【内容提要】**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并没有注意到苏联的民族问题，在改革的过程中更多强调的是给公民以民主权利，而没有想到改革不合理的联盟体制，错过了改革联盟的良机，使波罗的海三国争权益的运动发展成要求独立的运动，戈尔巴乔夫没有找到好方法阻止这三国的独立。叶利钦在波罗的海三国独立问题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所领导的俄罗斯联邦争主权和最终抛弃联盟的行为，直接导致了苏联彻底解体。

**【关键词】**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 联盟 解体

苏联解体后，俄共把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都当成苏联解体的罪魁，甚至要审判他们。他们二人对苏联解体的态度却有不同，戈尔巴乔夫强调自己一直是联盟的捍卫者，为苏联的解体感到惋惜；叶利钦则强调苏联解体是人民的选择，俄罗斯联邦放弃帝国的道路，不让苏联这个帝国继续存在，给各族人民以选择的自由，是一件好事。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作为领袖的个人自然也起了作用。在苏联联盟国家解体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们的作用显然是不一样的。

## 一、戈尔巴乔夫行动迟缓，错过改革联盟的良机

宪法规定苏联是联邦制国家，但随着苏联模式的形成，苏联实际上变成了单一制国家。在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中央集中了大量的权力，地方权限很少，各加盟共和国支配的工业产品还不到全苏工业总产值的 10%。各共和国感觉没有平等地位，他们只是中央命令的执行者，根本谈不上有自己的经济自主权。这种单一性体制的权力不平衡潜藏着严重的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80 年代中期在改革开始时，并没有涉及任何民族问题方面，在 1987 年 11 月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戈尔巴乔夫还盛赞苏联民族问题的解决，他认为，“在连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没有消除族际怨仇这个背景的衬托下，苏联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sup>1</sup>“如果我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问题，那就不会有今天的苏联，它在社会、文化、经济和国防方面就不会象今天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如果没有使各共和国在事实上日益平等，如果没有在兄弟情谊和合作，互相尊重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结成共同体，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存在下去。”<sup>1</sup>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盲目乐观并不能消除民族问题，1988 年 2 月纳—卡问题尖锐化，在 2 月 28 日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才真正认识到民族问题的严重性，他说：“应该给这些问题排排队。现在应该首先结

<sup>1</sup>（苏）米·谢·戈尔巴乔夫，岑鼎山等译，《改革与新思维》，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8 年，第 101 页。



东亚美尼亚混乱的局势，我们已授权（中央）书记处：着手研究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心平气和地研究，也不要弄明白多少就公布多少。在此要让他们的人也参加，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参加。应该成立一个代表委员会：由学者、知识分子组成，而不要只让党务和政工工作者参加。政工人员总是过多地束缚于分析事实的工作上：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现在应该组建一个更加民主的委员会，指定领导人，让他们去考察、访问、讨论。”<sup>1</sup>

改革联盟体制，从实际上的单一制向联邦制过渡，扩大共和国和自治体的权力，扩大地方的管理职能，应该是当务之急。但是，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之初根本没意识到这一问题，没有对联盟体制及时做出修正，没有想到改组联盟。1989年5月11日在讨论波罗的海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曾提出，“如何实实在在地改造我国的联邦制要思考、再思考。否则真的要全部完蛋。”<sup>2</sup>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提出，要划分联盟、共和国、自治区的权限。苏共中央也终于决定在1989年9月召开专门讨论民族问题的中央全会，反映各地代表不同要求的信件寄到了苏共中央，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党在目前条件下的民族政策（苏共纲领）》，提出的基本任务是：对苏维埃体制加以改造，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内容加以充实；扩大各种不同形式的民族自治的权利和机会；保证每个民族的平等权利；为自由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创造条件；加强各种保障，以杜绝根据民族特征限制公民权利。<sup>3</sup>但这个决议并没有真正实施，也未能遏制分离主义，9月23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共和国主权宣言，25日立陶宛宣布1940年并入苏联不合法。

虽然苏共中央九月全会首次提出了制订并签订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但直到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后才把这一问题提上日程，戈尔巴乔夫本人则直到1991年春天才积极加入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进程中来。纳扎尔巴耶夫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基本错误在于，他没有倾听加盟共和国要求赋予他们经济独立的呼声。除波罗的海诸国外，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含哈萨克斯坦在内，并没有追求分离、完全和盲目的独立。我们想到一点——可能会自我掌握本身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及其同伙应及时向各共和国提供在联盟框架中最大的独立。我相信，国家可以避开以后很多动荡。”<sup>4</sup>他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波罗的海三国起初也未要求独立，他们只是要求扩大共和国的权力，在1989年5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代表团坚决主张实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拟定了共和国经济独立草案，他们还坚决要求调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情况，并对该条约的后果进行评估。1989年年中“萨尤季斯”事实上获得了共和国的政权后，逐渐变成了主张国家脱离联盟的力量。

1989年8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50周年，“萨尤季斯”组织了名为“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活动，三国居民组成几百公里的“波罗的海人链”把三国的首都连接起来，三国有1/5的居民走上街头，“几乎所有的普通劳动者都不接受斯大林于1939年强加的这个强制性的联盟，渴望独立。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已从戈尔巴乔夫保证国家统一的同盟者变成了敌人。改革首倡者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要么是可保证群众自由发表意见的民主的深入，要么是保住联盟。”<sup>5</sup>戈尔巴乔夫选择了民主。1990年1月11日，戈尔巴乔夫携夫人到立陶宛，同各方人士进行接触，劝说他们留在联盟内，“分离会损害各族人民的利益。独立自主、重新划分权限、非集中化都是对的。但是要保留合作和相互配合。批评联邦制没有意义，这一制度在我国从来没有过，我们至今一直生活在单一制的国家中。让我们先在现在的联邦制中生活吧，以后再确定去向。我们可借鉴世界联邦制国家的正面经验。”<sup>6</sup>

<sup>1</sup>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600页。

<sup>2</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21页。

<sup>3</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22-123页。

<sup>4</sup> （哈）努·纳扎尔巴耶夫著，陆兵、王沛译，《时代、命运、个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60页。

<sup>5</sup> （俄）安德烈·格拉乔夫著，述弢译，《戈尔巴乔夫之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33页。

<sup>6</sup> （俄）米·谢·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第123页。

但戈尔巴乔夫的劝说没起作用。面对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要求，戈尔巴乔夫应对无策。在1990年3月22日讨论形势时，瓦连尼科夫将军建议对立陶宛实行紧急状态、总统治理、派遣军队等措施，戈尔巴乔夫不予考虑，他要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4月3日匆忙通过了退出苏联法，实质上这是一个限制加盟共和国退出的法律。戈尔巴乔夫试图通过经济封锁迫使立陶宛屈服，4月15日，宣布对立陶宛实行严厉的经济制裁，提高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对许多重要商品禁运。结果适得其反，损害了中央的形象，加剧了立陶宛反抗联盟的情绪，他们召回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中的立陶宛籍人民代表，并宣布建立自己的军队。立陶宛共产党发生了分裂，大部分人站到独立力量一边，小部分转入地下。戈尔巴乔夫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他不知道该如何维护苏联的宪法和维护统一。“戈尔巴乔夫的犹豫不决，促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三国领袖越走越远。”<sup>1</sup>

对于波罗的海三国不断发展的独立倾向，戈尔巴乔夫也曾倾向于用强力手段解决。1991年1月10日，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立陶宛恢复苏联宪法的效力，立陶宛没有答复。立陶宛内部要求立陶宛留在苏联的人们积极行动起来，成立了救国委员会。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认为局势可能失控，“萨尤季斯”与救国委员会可能发生冲突，要求实行总统治理。1月11日立陶宛“民族自救委员会”成立，他们向常驻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卫戍区和波罗的海军区求援。军队于1月12日控制了维尔纽斯电视台，当夜，坦克开进了维尔纽斯，13日凌晨1时30分，坦克包围了立陶宛电视台大楼，克格勃特种部队强行占领了这座大楼，有14名立陶宛人和1名特种兵战士死亡；军队在进入议会大楼时，遭到群众阻挡而停了下来。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基斯号召市民抵抗，保卫立陶宛共和国，苏联其他共和国也声援，国际社会反响强烈，美国、欧洲许多国家、日本等都发表声明，指责苏联在立陶宛用兵。在内外压力下，维尔纽斯卫戍区部队撤回了兵营。这次事件挽救了正在丧失威信的兰茨贝基斯等民族分离势力，转移了人们对他们提价政策的不满，却损害了苏联的形象，给国际社会造成了民主受到暴力镇压的印象，立陶宛共产党以及一切被公众认为同这次事件有关联的力量实际上被消灭了。

叶利钦等民主反对派借立陶宛事件对戈尔巴乔夫等人进行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叶利钦飞到爱沙尼亚，与波罗的海三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起商讨对策，表示相互支持，并呼吁联合国秘书长召集紧急会议。1月20日“民主俄罗斯”运动在莫斯科组织20多万人参加的游行，声援立陶宛，要求苏联总统、国防部长辞职，要求俄罗斯有自己的总统和军队。戈尔巴乔夫声称发生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事绝对不是总统的路线，他要求政治组织通过法律途径获取政权，不要使用武力。<sup>2</sup>

法律手段不起作用，军事手段行不通，戈尔巴乔夫只能听之任之，1991年2月9日，立陶宛举行全民公决，90%的公民投票支持国家独立。此后，波罗的海三国脱离苏联已成定局。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起了示范性作用，大大鼓舞了其他共和国民族主义的发展，1990年以后苏联经济状况恶化，苏共和联盟中央机关的瘫痪，为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方便。

## 二、叶利钦与联盟争主权，引发主权大检阅

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实际上无法动摇苏联的根本，它们三国人口只占苏联人口总数的2.8%，也不拥有重要资源。最后埋葬苏联的是俄罗斯的民族分离主义，因为俄罗斯是苏联的支柱，苏联虽然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力量并不平衡。苏联的面积是2240.22万平方公里，俄罗斯的面积是1707.54万平方公里；1981年苏联的人口是2.666亿，俄罗斯的人口为1.39165亿。<sup>3</sup>在

<sup>1</sup>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社科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sup>2</sup>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 АСТ.2007. С.202.

<sup>3</sup> 《苏联百科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71页。

自然资源、经济实力等方面，俄罗斯联邦都占有绝对优势，苏联可以没有波罗的海三国、可以没有外高加索三国，但不能没有俄罗斯。

在苏联各地民族主义思潮奔涌、民族分离主义日益发展之时，作为苏联最大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并没有站在联盟一边，叶利钦为了与戈尔巴乔夫争权，对民族分离主义浪潮推波助澜，是波罗的海三国与联盟争权和独立运动的积极支持者，1990年6月12日，在叶利钦等人的鼓动下，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903票赞成，13票反对和9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国家主权的声明》，宣布俄罗斯联邦是一个主权国家，俄罗斯宪法和法律在俄罗斯全境内至高无上，俄罗斯联邦保留退出苏联的权利。这表明：“俄罗斯内部倾向获得主权的情绪开始迅速发展。这种情绪是渴望与努力在本国疆域内团结起来，永远摆脱这样的状况：在俄罗斯发号施令的同时，又在许多方面与苏联融为一体。在俄罗斯的许多地区—非黑土地带、外乌拉尔、远东走向经济上荒芜和衰退的同时，俄罗斯仍是输血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不满。”<sup>1</sup>俄罗斯主权宣言发布后，其他共和国，包括自治共和国也相继通过类似宣言，开始了“主权国家大检阅”，严重干扰了联盟中央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意大利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甚至把这一天看成是苏联开始终结的准确日期：“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以绝大多数的选票赞同了其主席鲍里斯·叶利钦宣布俄罗斯为主权国家的提议。这就是所有接踵而至的分立主义倾向的起点和开端，这些分立主义分子先是断送了苏联，而后是俄罗斯。”<sup>2</sup>在俄罗斯的示范作用下，到1990年12月又有9个共和国：乌兹别克、摩尔多瓦、乌克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土库曼、塔吉克、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发表了主权宣言。1990年10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法令，重申联盟法律优先于共和国法律，但同一天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规定在俄罗斯境内共和国法律高于联盟法律。

在这种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把改革联盟体制、建立新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提上了日程，1990年12月24日，苏联第四次人代会通过了《关于新联盟条约的总构想及其签署程序》的决议，决定把现行联盟改组为“自愿平等的主权共和国联盟—民主的联邦制国家”。决定由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条约的起草工作和决定签署的程序。为了取得民意的支持，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91年1月16日通过决定，在3月17日就是否保存革新后的联邦举行全民公决。1991年初建立了起草新联盟条约草案的专家小组，领导人是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弗·尼·库德里亚夫采夫和总统的两个代表：列文科和沙赫纳扎罗夫，参加这一小组工作的有经济学家、法学家、政治学家，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参加讨论和做出决定。加盟共和国的对抗使中央名存实亡，为摆脱危机，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通过签署新联盟条约来寻求出路。

与此同时，俄罗斯与中央之间的矛盾加剧，在1991年初，莫斯科街头游行不断，矿工举行罢工，不断提出让苏联总统和内阁辞职，1991年2月19日叶利钦在苏联电视台发表讲话：“事情已经非常清楚，戈尔巴乔夫保留‘改革’这个词的同时，不愿意进行实质上的改革，他要保存现有体制，保存强硬的中央集权，不给予各加盟共和国特别是俄罗斯以独立自主。……我完全不同意总统的立场和政策，我要求他立即辞职。”<sup>3</sup>3月9日叶利钦声明：“我们不需要现存的任何形式的联盟，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中心——庞大的、官僚化的，……我们应该摆脱它。改革已经进行了6年，一切让我们相信，我们正在破坏这个体制，我们事实上已经走上了民主的革新，原来这是一个谎言。”<sup>4</sup>叶利钦摆出了一副要与联盟中央对着干的架势。

叶利钦想阻挠和破坏全民公决，他认为：“全民公决的目的，其一是为了赋予全国范围内的紧急状态以合法性质，其二是为了取得同俄罗斯的独立进行斗争的‘合法权利’。”<sup>5</sup>1991年1月

<sup>1</sup> *Примаков Е. Годы в большой политике. М.: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1999. С. 76.*

<sup>2</sup> (意) 朱利叶托·基耶萨，徐葵等译：《别了，俄罗斯！》，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118页。

<sup>3</sup> (俄) 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东方出版社1995年，第27页。

<sup>4</sup>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жка. М.: АСТ. 2007. С. 212.*

<sup>5</sup> (俄) 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第26页。

26-27 日在哈尔科夫召开“主权共和国民主力量大会”，有来自 11 个加盟共和国的 40 多个政党和运动参加，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民主俄罗斯运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号召对 3 月 27 日举行的是否保留联盟的全民公决说“不”。<sup>1</sup>2 月 7 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决定在全民公决票上加上第二个问题：“您是否同意设立全民投票选出的俄罗斯联邦总统职位？”目的是巩固自己在与联盟中央关系中的地位。在 3 月 17 日全民公决中，俄罗斯联邦有 76% 的公民参加了全民公决，表决的结果很奇怪：一方面有 71.3% 的参加者赞成保留革新后的联盟，另一方面有 70.8% 的人赞成在俄罗斯设立总统职位，而这实际上是反对联盟的。俄联邦参加投票的人和赞成保留联盟的人在共和国中占倒数第一和第二，在俄联邦的中心地区，赞成保留联盟的人很少。

在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时，根据乌克兰最高苏维埃的决议，也加上了一个问题：您是否同意在组成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的宣言的序言中写明乌克兰的国家主权？有 80.17% 的人回答是肯定的，高于赞成保留联盟者（70.2%）。这确定了乌克兰法律高于联盟法律的思想基础，在事实上排除了建立新的联邦制国家时乌克兰完全合乎要求加入的可能性。<sup>2</sup>在地位仅次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哈萨克斯坦，89% 的公民参加了投票，对于全民公决的问题，94% 的人给予了肯定的回答。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吉尔吉斯、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土库曼斯坦赞成保留联盟者的比例分别为：82.7%、93.7%、94.6%、93.7%、96.2% 和 97.9%。<sup>3</sup>从全民公决的结果可以看到，对保留联盟的最高支持度来自中亚各共和国，而最低的竟然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达维亚、拉脱维亚、亚美尼亚、爱沙尼亚这六个共和国没有参加全民公决，联盟中央对他们没有办法，这实际上意味着它们已经分离出去了。

全民公决后戈尔巴乔夫忙于制定新联盟条约，叶利钦则忙于与其他共和国加强双边联系，以增强与戈尔巴乔夫讨价还价的资本。积极推动苏联解体的布尔布利斯回忆道：“还在 1991 年 4 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代表团多次举行会晤，在此之前就与这些共和国签订了双边协议。这些协议能够成为新联盟条约（没有当局竭力保留的具有极权主义内容的联盟中心）的基础，但是，卢基扬诺夫和戈尔巴乔夫注意到这样做对他们的危险后果，依靠新奥加廖沃进程轻易阻止了我们。”<sup>4</sup>1991 年 5 月 5 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决定建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6 月 12 日，俄罗斯举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总统选举，叶利钦以 57.3% 的得票率当选为俄罗斯联邦的总统，巩固了自己作为俄罗斯主人的地位。叶利钦当选总统是对中央政权、苏共、俄共的打击，“设立俄罗斯总统，并且赋予他很大的权力，这本身就意味着，在苏联国家大厦下埋下了一个巨大的地雷。在俄罗斯即将出现一个新的，与苏共中央没有任何联系，并且基本不依赖于苏联政府和苏联总统的权力中心，出现一个与苏联竞争的国家。”<sup>5</sup>戈尔巴乔夫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由苏联人民代表选出的，叶利钦则是被民意推上了俄罗斯总统的宝座，使他这个“小总统”比戈尔巴乔夫这个“大总统”更加强有力，同时，波波夫当选莫斯科市长，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市长，实际上苏共在俄罗斯联邦已失去了执政地位。

叶利钦当上总统后便开始自行其是，他访问美国，表示要独立自主地与美国发展关系，声明俄罗斯不执行苏联政府制定的下一年的经济计划，禁止各政党和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和组织在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关、团体、军队和企业中设立基层组织和进行活动。对叶利钦针对联盟中央和苏共的这些命令与决定，戈尔巴乔夫无力进行改变。为了争取叶利钦能够签署新联盟条约，戈尔巴乔夫做出了最大程度的让步，联盟中央只保留了制定安全、外交、社会政策以及协调经济活动等权力。1991 年 7 月 12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关于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的决议，7 月 23 日，各共和国领导人再次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会晤，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总理、外交部长、国

<sup>1</sup>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 АСТ.2007. С.203.

<sup>2</sup> Барсенков А. С., Водвин А. 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38—2002. М., 2003. С.374.

<sup>3</sup>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 АСТ. С.215—216.

<sup>4</sup>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ка. М.: АСТ.2007. С.220.

<sup>5</sup> (俄) 罗伊·麦德维杰夫著，王晓玉等译，《苏联的最后一年》，第 46 页。

防部长均到会。卢基扬诺夫说，最后一次讨论关于主权国家联盟条约最后文本的会议上仍是非建设性的。有人建议从条约中删除提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主权联邦国家的内容，他们拒绝它有财产权，坚持只有一套税收系统。乌克兰代表在会谈中宣布，乌克兰将不会在9月中旬前决定自己与联盟条约的关系问题。15个加盟共和国中只有8个准备签署条约。<sup>1</sup>1991年8月16日苏联各大媒体也争先公布了新联盟条约文本。按照新公布的条约文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简称仍为苏联。<sup>2</sup>新条约规定，“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为平等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联邦制主权民主国家”，“缔约的每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保留独立决定涉及本国发展的一切问题的权利，在国际关系中苏联为一个主权国家，但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联盟成员国的相互关系原则是：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合作互助、诚实履行根据联盟条约和共和国间协议而承担的义务。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作为主权的联邦制的民主国家，但主权共和国是第一位的，条约规定，在联盟职权范围内，联盟法律至高无上；在共和国职权范围内，共和国法律在本共和国境内至高无上。土地、矿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均为各共和国所有。联盟没有税收权，联盟的财政预算要取决于共和国提供多少，条约中没有新的宪法通过的期限，也没有确定参加者的义务。条约自签字之日起生效后，1922年的联盟条约即同时失效。

1991年7月29—30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纳扎尔巴耶夫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秘密会晤，戈尔巴乔夫建议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总统不是在9—10月，而是在8月20日开始签署条约。共和国的领导人同意了这一建议，因为他们明白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人代会不会通过这样的条约，而8月份人民代表们正在休假，是签订条约的好时机。在交换意见中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共和国领导人关于在财政预算中实行单一的税收体系的建议。戈尔巴乔夫还同意解除总理帕夫洛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克拉夫琴科、副总统亚纳耶夫的职务，他们三人商定由纳扎尔巴耶夫任总理。叶利钦在谈到新奥加廖沃条约时说：“我同戈尔巴乔夫突然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们二者的利益终于相互一致了，这些角色让我俩完全满意。戈尔巴乔夫保住他最高的职位，我则保住自己的独立。这对于我们二人而言乃是理想的决策。”<sup>3</sup>

认为万事大吉的戈尔巴乔夫于1991年8月5日去克里米亚休假，计划8月19日回来，莫斯科准备好在20日的签约仪式。8月19日，以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强硬派发动了政变，他们本意是挽救联盟，但政变不得人心，只坚持了三天。8·19事变产生了两个直接的后果，一个是使戈尔巴乔夫离开了权力，大大加强了叶利钦的权力，很多人站到了叶利钦一边；另一个是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使各种政治力量，特别是激进力量得到发展，而共产党的力量不再起作用。俄罗斯实际上已经顶替联盟中央，这让许多共和国不满，也促进了独立浪潮的发展。8·19事变后，苏联国内掀起了一场独立的浪潮，各国纷纷发表独立声明，确定总统选举日期，起草宣言。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于8月20—21日宣布独立，恢复1940年以前的宪法。8月2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承认波罗的海三国独立。8月24日，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是独立的民主国家，将于1991年12月1日就乌克兰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在别洛韦日协定签订前只有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没有宣布独立。

### 三、叶利钦决定抛弃联盟，苏联解体

尽管8·19事件后许多国家宣布独立，但只要俄罗斯联邦不独立，中亚国家也不会真正独立，就算不能保持原来的大苏联，保持小苏联还是有可能的，关键是叶利钦的态度。为了争取俄罗斯的支持，戈尔巴乔夫不断向叶利钦让步。叶利钦等人认为应该先签署经济联盟条约，这比签署政

<sup>1</sup> 转引自 Барсенков А.С., Вдовин А.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38-2002. М.: Аспект Пресс,2003. С.375.

<sup>2</sup> 在俄文中“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的缩写一样，都是“СССР”。

<sup>3</sup> (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第45页。

治协议简便易行，因此在 1991 年 9 月至 10 月初做的主要是这一工作。该工作由亚夫林斯基具体负责，亚夫林斯基认为主要任务是加强主权国家的团结，以建立共同的市场经济，以利于克服经济危机，他强调加入经济联盟并不一定以签署主权国家政治联盟条约为条件。

经济共同体协定草拟的工作进展顺利，到 10 月初已经基本完成草案，10 月 12 日在阿拉木图敲定所有条款，10 月 18 日在克里姆林宫有 8 国签署“主权国家经济共同体协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缺席，乌克兰派来的是没有被授权的代表。《协定》由十二章 59 条组成，从苏联已经被破坏这一事实出发，建议分割国家的财产，取消统一的中央银行，允许各共和国有自己的货币，为了使这一协议得以实施，还需再签署 20 项具体经济领域的补充协议，而这需要至少 4 个月的时间。戈尔巴乔夫并不想止步于经济共同体协定，他也在加紧拟定新政治联盟条约的工作。但这一进程不断遭到叶利钦等人的阻挠。10 月 28 日，叶利钦在俄罗斯第五次人代会上表示要独立行事，11 月 2 日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进行了一次谈话，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说：“让我们按男人的方式谈谈。你改变了政策，从所有谈妥的协议后退了。既然这样，国务委员会、经济协议都失去了意义。既然你想把缰绳抓在自己一个人手里，我提出辞职。我将不参加。我要告诉所有人：看看，朋友们，15 个共和国的领导人，我把你们引向独立，现在你们好象不再需要联盟了，那么你们好自为之吧，用不着我了。”叶利钦竭力争辩说自己并没有打算改变政策。<sup>1</sup>11 月 4 日又召开了国务委员会会议，8 个共和国的总统和乌克兰与亚美尼亚的总理参加，戈尔巴乔夫说准备联盟条约进展困难，他希望各国领导人理智和负责任地行事，尽快签署联盟条约，挽救联盟的命运，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戈尔巴乔夫的话讲到一半时叶利钦才到会，也没有表态。纳扎尔巴耶夫说：“我们已经原则上表示了支持，现在需要讨论具体细节……应该一起走向市场经济，如果我们是在经济协议的框架下行事，我没有问题。如果不是，则是另一码事。”<sup>2</sup>戈尔巴乔夫努力促使新的联盟条约早日签署，11 月 5 日向苏联国务委员会成员分发了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未来的联盟定名为主权国家的联盟（ССН），这是具有全权、自愿参加的民主国家的联盟。

11 月 14 日，在新奥加廖沃召开了国务委员会会议讨论新联盟条约草案，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人参加，戈尔巴乔夫表示不能允许联盟解体，但叶利钦马上说舒什克维奇反对统一国家的形式。于是，这些领导人首先讨论联盟的形式。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应该确定，今天集中到这里的人，至少也应该建立一个有统一的军队、领土和边界的政治联盟的愿望。”戈尔巴乔夫坚持应该有统一的国家，舒什克维奇说“这个邦联国家应该有统一的军队”。叶利钦补充说还应该有统一的交通、空间和生态。戈尔巴乔夫则说：“如果没有有效的国家机构，为什么需要总统和议会？如果你们这么决定，我就离开。”叶利钦说他太情绪化。最后叶利钦向记者表示达成了协议，建立的联盟将是民主的邦联国家。<sup>3</sup>所有领导人都说会有联盟，会议确定 1991 年 11 月 25 日草签联盟条约。

11 月 25 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的国务委员会会议上，提交签署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sup>4</sup>实际上满足了叶利钦的要求，条约规定：联盟的每个参加者都是主权国家，主权国家联盟为邦联制民主国家，在协议参加国自愿赋予它的权限内行使权力。参加联盟的各有独立决定自身发展一切问题的权利，独立决定自己的民族—国家和行政结构、国家体制、权力机构和管理体制。在国际关系中主权国家联盟是“主权国家、国际法的主体—苏联的继承国”。联盟拥有一支集中统一的武装力量，条约参加国有权建立自己的军队。<sup>5</sup>戈尔巴乔夫要求与会者草签条约，没料到叶利钦又变卦了，“戈尔巴乔夫关于草签的声明迫使各共和国领导人对条约内容进行根本修改，主要是使剩余的权力从中央向各共和国转移。苏联总统起初起跟与会者好言相商，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急躁，

<sup>1</sup> АГФ.Фонд №10.опись №2.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га. М.: АСТ.2007.С.366.

<sup>2</sup> В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записям Анатолия Черняева, Вадима Медведева, Георгия Шахназарова (1985 – 1991)», 2-е изд., исправ. и доп. М.:Горбачев-Фонд,2008. С.742.

<sup>3</sup> В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записям Анатолия Черняева, Вадима Медведева, Георгия Шахназарова (1985 – 1991)», 2-е изд., исправ. и доп. М.:Горбачев-Фонд,2008. С.746—747.

<sup>4</sup> 1991 年 11 月 27 日《真理报》登载了这个《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

<sup>5</sup>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га. М.: АСТ.2007.С.395—405.

越来越激动。不管他说什么，就是没有人听。各共和国领袖执拗地要求中央授予更大的独立权，已尝到自由甜头的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真是软硬不吃，使戈尔巴乔夫无能为力。每当戈尔巴乔夫试图坚持自己的某个提法时，我们就异口同声地否定他的提法。”<sup>1</sup>叶利钦的精彩描述反映了当时戈尔巴乔夫的困境，也说明起决定作用的是叶利钦，叶利钦把戈尔巴乔夫保留联盟国家的努力看成是“拯救戈尔巴乔夫的联盟”。

俄罗斯代表团建议再次回到新联盟条约，取消“邦联制的民主国家”，而用“独立国家的邦联”，声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还没准备好批准先前达成的方案。此外，叶利钦宣布，签署“没有乌克兰的条约，是无益的事”，他建议要“等乌克兰”，而在12月1日前乌克兰不会举行全民公决。<sup>2</sup>这次会议达成折衷协议，条约将送交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审议，征得它们赞同后，再由各共和国首脑和苏联总统正式签署。但是，叶利钦实际上并不想签署任何有戈尔巴乔夫政治地位的条约，11月28日，叶利钦签署《关于改组俄罗斯联邦中央国家管理机关》的命令，使存在了近70年的联盟的部和局都转归俄罗斯联邦管辖。实际上叶利钦已决意埋葬苏联。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全民公决的结果是赞成乌克兰独立，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克兰首任总统，12月3日叶利钦率先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12月7日叶利钦率领一班人马，撇开戈尔巴乔夫来到白俄罗斯，与克拉夫丘克、舒什克维奇会晤，决定了苏联和戈尔巴乔夫的命运，为苏联的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

曾参与起草别洛韦日协定的沙赫赖认为，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的全民公决为这一解体进程画上了句号，“起先鲍里斯·叶利钦和斯塔尼斯拉夫·舒什克维奇还希望说服列奥尼德·克拉夫丘克以某种形式保留联盟。……然而乌克兰总统甚至不愿听到‘联盟’这个词，最后找到了‘联合体’这一形式作为各国在同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空间共存的方式。”<sup>3</sup>

这种说法并不能推卸叶利钦的责任，如果俄罗斯不选择独立之路，苏联不会彻底解体，没有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苏联都可能存在，但是没有了俄罗斯，苏联便不可能存在了。正如美国俄罗斯问题专家所说：“恰恰俄罗斯的利益和民族主义在苏联解体中扮演了主要角色。”<sup>4</sup>雷日科夫在谈到叶利钦的作用时也说：“为了攫取国家最高权力，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他用自己的行动千方百计鼓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乌克兰的以及其他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行动，以此作为同国家中央政权斗争的政治杠杆。一旦作出最重要决定的关头来临，他就毫不犹豫地跑到别洛韦日森林去有意识地展开了搞垮国家的行动。”<sup>5</sup>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斯拉夫国家的领导人发表声明，并签署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实体停止存在，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历史结束了。12月21日，原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没有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在阿拉木图签署协定，宣布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并通知戈尔巴乔夫苏联总统的设置被取消。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的职务，苏联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在改革之初没有注意到民族问题，没有及时革新联盟，使苏联长期积累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他过早推行以民主化、公开性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地方分离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尽管他后来竭力保住联盟，不惜做出巨大让步，但因为地方势力坐大，不与之配合，戈尔巴乔夫难达目标。在苏联解体的最后时刻，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叶利钦。在改革方向上叶利钦早已放弃了社会主义目标，政策难与戈尔巴乔夫一致，他凭借民众的支持和平息“8·19事变”有功，夺取了联盟的许多权力，可他仍不满足，最后决意抛弃联盟。苏联正是被叶利钦等人不顾民意埋葬的，其形式类似于一场政变。

<sup>1</sup>（俄）鲍里斯·叶利钦著，李垂发等译，《总统笔记》，第129页。

<sup>2</sup>转引自 Барсенков А. С., Вдовин А. И.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1938-2002. М. 2003. С.391.

<sup>3</sup>沙赫赖：《苏联解体的谎言与事实》，载杨新宇、谢尔盖·沙赫赖、阿利克·哈比布林，《变动中的法与宪法》，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18页。

<sup>4</sup>（美）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杨烨等译，《俄罗斯史》（第七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93页。

<sup>5</sup>（俄）尼·伊·雷日科夫著，徐昌翰译，《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386-387页。



## 【评 述】

# 2009 年国外社会学的族群研究回顾

马戎，马雪峰，祖力亚提·司马义，阳妙艳，赵蕊

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后，已进入“全球化”进程的世界格局发生了许多人们未曾预料的重大变化，许多地区性的冲突仍在继续加剧，许多现象人们在传统的思维逻辑中找不到答案。通过自己的学术研究来为社会和民众提供符合社会实际状况、揭示社会发展深层规律，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责任。但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究竟能够在什么范围和深度上把握人们的困惑和思索，能够在什么层面上为人们提供理解当今世界宏观走向和面对各种社会矛盾的令人信服的解答，人们期待社会学家们为民众和政治家们提供新的理论框架和思考问题的视角。

近几年中国社会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例如 2009 年乌鲁木齐“7·5 事件”使中央最高领导人和全国民众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民族关系。在这样一个 13 亿人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进程中，中国社会学家们必须担负起我们的历史职责，除了深入开展社会调查研究，也需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及其内在机制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分析，同时需要了解西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曾遇到、正在面临的民族主义、种族与族群关系问题，了解各国对本国族群矛盾的应对办法及实践效果。各国社会科学家在这些领域中的研究成果和理论归纳，毫无疑问是我们接触和吸收这些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

自 2007 年开始，教育部组织有关专家对国外各学科的前沿进展进行综述性介绍，本文作者作为一个课题组负责“社会学”学科的进展介绍。2008 年和 2009 年的“社会学”报告分别发表在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秘书处组编的《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2008》和《国外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2009》（高等教育出版社）中，由于这些报告必须涵盖社会学研究的诸多领域，因此对种族-族群研究这一领域的论文只选取了部分进行介绍。本文是对 2009 年 4 种英文期刊关于种族/族群研究论文的完整介绍。我们选择了国外社会学界公认最重要的 4 本英文学术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AJ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ASR）、《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Social Forces》作为向读者介绍的对象。2009 年这 4 种期刊共发表论文 204 篇，书评 207 篇。其中数量最多的集中在移民与种族/族群研究这个核心领域（表 1）。本文将对 2009 年这 4 个期刊发表的移民与种族/族群研究论文进行简略的介绍，读者可以大致了解到 2009 年度国外社会学研究在种族/族群的前沿选题以及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命题等方面的最新进展。对这些论文的具体论证、所用数据和分析方法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进一步去查阅论文原文，因此，本文提供的信息可以被看作是这些论文的索引。

在 21 世纪，无论是领先进行工业化的西欧，是拥有古老文明历史的中国和印度，是由欧洲白人殖民者建立的澳洲和北美洲国家，还是从百年殖民地苦难中得到独立的非洲国家，可以说今天地球上如何一个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多种族、多族群的社会。由于今天的族群格局是历史上迁移的后果，各群体通常都或多或少保持着自己祖先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许多隔阂、矛盾与冲突就是在这些传统文化差异和身份认同差异的基础上出现的，这些隔阂与矛盾如果能够被及时化解，这些矛盾就可以避免演变为街头骚乱和流血冲突。但是如果想要真正化解种族和族群矛盾，并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加强各个独立国家的内部凝聚力，努力达到各族的共同繁荣，从目前来看，唯一的恰当处理方针就是在各族成员中逐步把**国家公民**的政治认同建立起来、并使其成为核心认同身份，同时把各族的文化传统、血缘关系和宗教信仰做文化特征，在彼此尊重和平等的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和谐共处。这应当是各国解决种族、族群、宗教冲突的唯一出路。



表 1、2008 年、2009 年 4 种期刊所发表论文的研究专题分布

研究主题	AJS		European SR		Social Forces		ASR		各主题总篇数		各主题百分比%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2008	2009
移民/族群研究	7	7	5	4	12	13	6	12	30	36	14.7	18.2
婚姻、家庭、性别研究	2	4	8	9	11	8	9	5	30	26	14.7	13.1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4	5	3	7	-	2	5	2	12	16	5.9	8.1
组织与制度研究	2	5	-	-	-	2	7	4	9	11	4.4	5.5
经济社会学	3	4	-	2	-	4	4	2	7	12	3.4	6.0
教育研究	-	1	7	1	4	9	3	2	14	13	6.9	6.5
政治社会学	4	4	3	-	10	6	-	2	17	12	8.3	6.0
社会网络、社会资本	-	-	2	2	4	1	-	2	6	5	2.9	2.5
人口问题、青少年	-	-	-	-	-	5	2	2	2	7	1.0	3.5
文化、宗教	3	5	-	1	11	6	4	2	18	14	8.8	7.0
法律研究	1	-	-	-	3	6	2	2	6	8	2.9	4.0
社会政策	-	-	1	-	-	-	-	1	1	1	0.5	0.5
劳动问题	-	-	9	9	4	-	-	3	13	12	6.4	6.0
社会保障、社会福利	-	-	1	4	-	-	-	-	1	4	0.5	2.0
研究方法	-	-	1	2	-	-	-	4	1	6	0.5	3.0
环境问题和灾难研究	-	1	-	-	7	1	-	-	7	2	3.4	1.0
社会心理学	-	-	-	-	3	-	-	-	3	0	1.5	0.0
医疗健康	-	-	-	-	-	3	-	-	-	3	0.0	1.5
其他专题	5	2	1	1	3	1	3	1	12	5	5.9	2.5
(专辑)遗传学与社会学	11	-	-	-	-	-	-	-	11	-	5.4	-
(专辑)全球化	-	-	-	6	-	-	-	-	-	6	-	3.0
论文总计	46	38	41	48	72	67	45	45	204	199	100.0	100.0
书评总计	143	205	6	7	58	58	0	0	207	270		

美国自殖民地时代开始就是一个多种族、多族群的移民国家，种族冲突和移民问题是几百年来困扰美国社会的最主要的核心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有关移民/族群的研究一直是美国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领域。欧洲各国既是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一现代国家形式的发源地，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吸收非洲、南亚和中东移民的地区，历史和现实使种族和族群问题成为美国和欧洲社会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因此美国和欧洲国家的社会学界始终高度关注种族/族群研究。

中国从秦汉以来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现在我国少数民族人口超过 1 亿，少数民族自治地方面积占我国陆地领土的 64%，民族关系问题至关重要。但是长期以来，我国社会学界以至除“民族学”之外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对民族问题都缺乏必要的关注。一个最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教育部组织编写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2009》，这本书以“一级学科”为单元系统介绍我国大学 2008 年在各文科领域研究活动与成果，但是在全书十八章中，只有“民族学”这一章谈及民族关系研究、民族发展问题、民族经济和民族教育等专题，其他所有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都极少涉及到民族问题。这本《发展报告》中的“社会学”一章只字不提民族研究，甚至“马克思主义”这一章也完全不涉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这充分反映出中国社会科学各个学科对民族研究的系统性忽视，以及民族研究以“民族学”为依托与其他所有学科之间的某种隔绝。

自从 1999 年中央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西部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经济体制、人口迁移、就业竞争、资源分配格局都出现了重大变化，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可以对族群利益和发展机会进行调节的传统机制在新的市场机制下逐步失效，这些问题的积累必然导致民族关系出现新的矛盾。2008 年拉萨“3-14 事件”和 2009 年乌鲁木齐“7-5 事件”已经向全体国民显示出了西藏、新疆等地区的民族问题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甚至可以说在 21 世纪，族群矛盾和民族分裂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的最为严重的威胁。因此，无论从学术创新的角度还是分析现实重大社会问题的角度，中国社会学家对种族/族群关系领域的调查研究必须给予更多重视，

而向国内学者介绍国外社会学同行们对种族/族群问题的研究成果，为国内的民族研究者提供更为宽阔的国际视角、可供进行比较研究的各种案例、新的研究方法以及外国政府处理民族-族群关系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毫无疑问这对于我们认识与解决好我国的民族问题极为重要。

## 一. 美国社会学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 篇)

1、柏林大学 (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的格尔哈兹 (Jurgen Gerhards) 和汉斯 (Silke Hans) 的文章《从哈桑到赫伯特：文化涵化与族群坚守之间的移民家长取名模式》(From Hasan to Herbert: Name-Giving Patterns of Immigrant Parents between Acculturation and Ethnic Maintenance) 关注移民如何给自己孩子取名的问题。姓名往往标示了一个人族群归属。格尔哈兹和汉斯认为，当新移民家长为孩子取一个在迁入国社会里很常见的名字时，他们表现出与迁入国主流社会高度的文化同化趋向。相反，如果他们选择一个其原祖籍国常用的名字，他们所传达的则是努力保持其原属族群文化特征的信息。格尔哈兹和汉斯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德国社会经济研究所，包括了土耳其、西南欧洲以及前南斯拉夫移民的资料。作者试图说明，从取名的角度来看，文化涵化的程度取决于几个因素：祖籍国与迁入国之间的文化边界，移民被整合进迁入国社会结构的程度，跨族群网络，以及宗教归属等。

2、亚利桑那大学 (University of Arizona) Alexandra Kalev 的文章《分解玻璃罩：工作中的结构重组与先赋不平等》(Cracking the Glass Cages? Restructuring and Ascriptive Inequality at Work) 关注女性与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Kalev 指出，女性和少数民族在劳动力市场中做出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通常被隔离于低层的位置而且他们的贡献往往被低估。早期研究将职业成就看作是个人特征的结果，关于组织结构的研究则试图将组织系统本身带到分层研究中，他们讨论人事部门如何将女性与少数民族安排到一些特定的位置上以及这些工作如何被贬低。Kalev 指出，实际上，很少有研究关注职业隔离对机遇结构的影响，而这一隔离在不平等的再生产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被隔离的工作或职责可被视为“玻璃罩”，它制度化了工作晋升中的非正式藩篱。工作的组织系统特别是职位结构能够维持或侵蚀性别与种族劣势。围绕“团队工作”而重组的职员工作结构与弱化的职责边界能够提高女性与少数民族所具能力和所做贡献的可见度，从而减低他们在职业竞争中的劣势。而科层制的拥护者与之相反，他们认为宽松的岗位责任和对工作合作关系的强调反而会加深女性与少数民族的先赋劣势。Kalev 的研究检验了上述两种观点，研究结果表明，如果雇主采用流行的团队工作并实施项目培训，先赋性不平等的程度确实得以降低。

3、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 (SUNY Stony Brook) Arnout van de Rijt 与康奈尔大学 David Siegel 和 Michael Macy 的文章《邻里机会与邻里变化：对 Bruch 和 Mare 文章的评论》(Neighborhood Chance and Neighborhood Change: A Comment on Bruch and Mare) 是对密西根大学 Elizabeth E. Bruch 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Robert D. Mare 2006 年发表的文章《邻里机会与邻里变化》(Neighborhood Chance and Neighborhood Change, *AJS* 112 [2006]: 667-709) 一文的批评。

托马斯·谢林 (Thomas Schelling) 在他 1978 年出版的《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Micromotives and Macrobehavior) 一书中表明，即使能够容忍多样性的人群的人口数量占多数时，居住隔离也会发生。Bruch 和 Mare 在 2006 年的那篇文章中，试图挑战这一结论，他们的研究指出，只有个体的偏好选择遵从一定的阈函数时，高度的隔离才可能发生，他们指出，即使个体对于邻里中我群的轻微变化很敏感时，绝大部分情况下，也没有发生隔离的情况。Van de Rijt, Siegel, 以及 Macy 重复了他们 Bruch 和 Mare 的模型，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其经验函数导致的是隔离，而非整合；而其线性函数，只有人们居住的选择充分满足随机原则时，才可能导致隔离的发生。

4. Elizabeth E. Bruch 和 Robert D. Mare 的文章《隔离的参数选择与路径》(Preferences and Pathways to Segregation: Reply to Van De Rijt, Siegel, and Macy) 则是对 Van De Rijt, Siegel, 以及

Macy 文章的回应。Bruch 和 Mare 承认了他们 2006 年文章中对个人选择是否搬迁以及往哪里搬迁造成影响的连续函数的错误，但是他们也强调，尽管存在这一错误，2006 年文章中有关个人偏好对隔离动态的影响的结论仍然是正确的。

5、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 Lauren J. Krivo 和 Ruth D. Peterson 与波林州立大学(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Danielle C. Kuhl 的文章《隔离、种族结构与邻里中的暴力犯罪》(Segregation, Racial Structure, and Neighborhood Violent Crime) 关注种族居住隔离对暴力犯罪的影响。Krivo 等人的文章，运用结构种族主义(structural racism)与城市劣势(urban disadvantage)的研究路径，在不考虑种族/族群构成的情况下，讨论城市种族居住隔离对城市邻里中暴力犯罪程度的广泛影响。运用国家邻里犯罪研究的数据(全美 79 个城市的 7622 个邻里)，文章揭示了，无论是在白人邻里街区还是其他非白人邻里街区中，居住隔离绝对都与暴力犯罪有所关联。但是，这些街区之间的暴力并不具有对等性，这反映出更宏观的种族化社会体系，在这一系统中，白人能够利用其优势地位而居住于最具有便利位置的邻里街区，而非裔美国人与拉美人因其地位劣势而居住于最贫穷的城市街区，并因此成为城市犯罪式暴力与社会问题的首当其冲者。

6、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abino Kornrich 的文章《结合偏好与过程：分析黑人-白人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整合路径》(Combining Preferences and Processe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Black-White Labor Market Inequality) 关注劳动力市场中的族群不平等，并试图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解释。

黑人与白人的收入不平等和职业不平等依然是美国社会学家的重要论题。解释不平等的视角有多种，比如：雇主的歧视行为，中心城市里一些工作的消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人与工作之间的空间失谐，黑人工人与白人工人之间的技术差别等。这些理论分别考察了雇主的偏好，匹配工作与工人的过程，以及工人的特点等。每一项解释都分别受到了关注，但是很少有研究将这些解释整合在一起。相反，有些学者将这些因素看作是相互对抗的。但是，Kornrich 认为，实际上它们是相互补充的，它们关注了不同的劳动力市场过程，而不是对同一个流程做出不同的假设。

Kornrich 的研究试图提出一种革新的理论路径，将目前已有的关于黑人-白人劳工市场不平等的解释路径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理解劳动力市场不平等，并更准确地绘制产生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过程。Kornrich 以“排队论”(queuing theory)为出发点来建构这一框架。排队论认为，劳动与工作队列的分类和组成决定了工人与工作之间的相匹配。但是，排队论无法告诉我们，队列是如何被安排的，也没有描述序列界限的过程。而其他的理论则可以配合排队理论详细说明劳动与工作序列的分类，以及将工人和工作相匹配的具体过程。比如，威胁论认为，当黑人工人所占比例较高时，雇主会更歧视黑人。这暗示工作序列的分类会因人口比例而变化，但是工作队列的组成是独立运行的。这两种理论并不像以往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相互对立的，而是互相补充，它们预见产生了不平等的过程中的不同内容。其他理论则有利于了解工作队列的分类与轮廓。比如对雇主偏好的详细分析发现，不断增长的黑人经营者与劳工联合会发挥的作用说明了，实际上雇主偏好是多变的。

Kornrich 在以往几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整合的解释模型，其中包括威胁论、排队论、强调空间失谐、居住隔离与城市衰落的理论。接着，作者集中讨论劳动队列与工作序列的结构与分类来概括其理论模型。在此基础，Kornrich 指出职业分类与隔离在黑人-白人劳动力市场不平等中的重要性，并通过分析大都会区域中黑人与白人从事的具体职业变换提出测量不平等的方式。作者发现，劳动与工作队列的组成与分类不断影响着黑人与白人在职业劳动中的相对位置，但是居住隔离与劳动联合会的存在反而没有那么重要。Kornrich 建议同时考虑劳动力市场中的偏好与过程来理解不平等产生的多元环境。

7、伊利诺大学芝加哥校区(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 Maria Krysan, 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 Mick P. Couper, Reynolds Farley, 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

Tyrone A. Forman 的文章《种族因素在邻里偏好中是否起到什么作用？来自视频试验的结果》（Does Race Matter in Neighborhood Preferences? Results from a Video Experiment）关注种族因素在邻里选择偏好中的作用。

持续的种族居住隔离往往被视为选择偏好的结果：白人往往更愿意和白人生活在一起，黑人更愿意与其他黑人做邻居。这种邻里选择偏好反映了种族意识吗？邻里人口的种族结构是否对其选择构成有效的影响？或者，种族背后反映的是社会阶级差异？Krysan 等人的研究试图采用创新的试验方法来验证种族代表的假设，它排除了种族与社会阶级的有效效应（net effect），而代之以居住偏好中的社会心理学因素（如刻板印象、歧视、群内认同等）分析。作者发现，社会阶级网络与邻里居民中的种族构成对人们的选择有重大的影响。白人认为纯白人邻里大多都是很理想的居住街区。不过，在黑人群体中，种族构成的独立作用要小得多，他们认为种族混合的邻里更为理想。而且，对非洲裔美国人及其邻里持有负面刻板印象的白人深受其自身居住邻里中种族构成的影响。同时，没有哪一项社会心理因素能够预测非洲裔美国人对种族构成的敏感与回应。

## 二. 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2 篇）

1. 长久以来，对内战定量分析的众多文章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讨论多元种族或种族多样性是否导致武装冲突。Andreas Wimmer, Lars-Erik Cederman, and Brian Min 的《族群政治与武装冲突：对新的全球数据集的一种结构分析》（Ethnic Politics and Armed Conflict: A Configurational Analysis of a New Global Data Set）一文并未局限于这些讨论，而是明确表明高度多样化的社会不容易导致冲突。与之相反，权力被少数几个特定种族所掌握的国家往往容易导致严重的冲突。其一，仅仅是因为不同的种族背景，国家政权中就排除了人口占相当比例的种族，这样的国家很容易发生武装叛乱。其二，任何一个政权分割的国家，如果一些相互对抗的国家中坚分子共同掌权，严重的权力斗争会发生。其三，不同的政党不停地短期上台交替掌权的国家更容易遭受分裂冲突。本文利用新的种族权力关系数据汇集，研究了 1945 年后独立的所有国家，并且验证了上述三个假说。跨国分析表明了种族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一样，都是能够导致内战的强有力因素。本文通过使用多项选择回归模型，得出结论是叛乱、混战和国家分裂，分别源于高度的排外性、政权的分割性以及政权的不连贯性。文章作者最后指出，从另一方面讲，种族多元化的国家不容易发生严重的冲突。

2. Robert M. Kunovich 的《国家认同的缘起及结果》（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一文从对比和多层次的角度来审视国家认同这一观念。以身份认同、民族主义和偏见等概念为基础，文章分析了社会经济特点，政治特点以及文化特征之间的关系（如发展，全球化，民主治理，军国主义，以及宗教和语言多样性），个人特点（如社会经济地位和少数民族地位），还有国家认同内容上的倾向。文章也分析了国家认同的内涵和针对移民的公民权、同化和对外政策方面的公共优惠政策之间的关系。作者用确定性因素和多层次模式分析来自 31 个国家层面的相关调查数据（来自国际社会调查项目 2003 国家认同模块 2）。调查结果表明，个人特点和国家特征可以帮助国家认同中的变化性和竞争性的形成。此外，国家认同种类的内容对公共政策和族际关系的形成有着重大意义。

3. 《多样性是否带来好处？种族多样性、性别多样性和商业多样性三种案例分析》（Does Diversity Pay?: Race, Gender, and the Business Case for Diversity）一文作者 Herring Cedric 根据 1996-1997 国家机构调查的数据，对国家级的营利商业机构进行调查。文章检验了源自多样性价值论的论文中的 8 种假说，调查结果验证了其中的 7 种假说：职员的种族多样化导致了销售收入的增长，影响着客户规模、市场份额和相关利润的增长，职员性别多样化也与销售收入的增长有相关关系。相对于其他关于劳工多样化的观点，本文也讨论了调查结果的重要性。多样性价值论

认为相对于单一的劳工组成，多样化的劳工组成对商业的发展大有益处。其益处包括但又不仅仅局限在公司利润和收入上。这个观点是不同于其他观点的，其他观点认为商业成功和职工多样性之间毫无关联，而且多样性会通过制造矛盾冲突来损害商业成就、毁坏商业凝聚力和降低生产力。

4. 在有关种族平等就业机会的相关研究中，以往研究主要着眼于几个有限的因素及这些因素对组织结构和相关政策变化的影响力。Sheryl Skaggs 的《法律和政治压力促进非洲裔美国人进入管理层》(Legal-Political Pressures and African American Access to Managerial Jobs)一文则是从一个更为宽泛的视角出发，探讨一些具有潜在影响力的法律和政治压力的因素，即歧视诉讼、联邦法院的变化以及政治意识形态。文章分析了这些压力对改变组织行为所产生的重大意义。作者采用的数据是 1983-1998 年美国超市零售业的相关数据，采用的分析模型是 ADL 和固定效应模型，通过这些方法来判断非洲裔美国人获取管理职位的比例。结果表明在一桩针对某超市企业的法律诉讼案成功后，非洲裔美国人进入管理层的可能性增加。再者，从长远考虑，所产生的同类效应也将起作用。也就是说，受到起诉威胁的其他企业也开始调整自己的策略使自己的非洲裔美国人担任管理者的比例达到行业平均水平。最后，除了来自法律方面的压力外，联邦法庭法官的性别和种族多样化以及各州的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都对非洲裔美国人进入管理层起了重大作用。本文在最后还论了相关的后果以及系统地将政治进程和社会理论化结合起来的重要性，同时也分析了劳工的多样性。

5. 到了 21 世纪初，美国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分层仍然存在，而教育成就的差异依然是一个显著的屏障。近期关于黑人和白人儿童学业成就差异的研究指出一种令人费解的模式。学校教育表现为加剧了黑人和白人在学习方面的差距，而与此同时却减缓了社会阶层差距的增长。这是为什么？Dennis J. Condrón 的《社会阶层、学校和非学校环境，及白人和黑人儿童学习中的不平等》(Social Class, School and Non-School Environments, and Black/White Inequalities in Children's Learning)一文通过使用美国一项儿童早期发展纵向研究(ECLS-K)的数据，检验并论证了上述命题。作者认为学校教育是造成黑人和白人儿童学业成就差距的主要因素，而强化黑人和白人儿童社会阶层不平等的主要因素是非学校环境。上述研究结果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黑人和白人儿童学业成就差距的增大主要发生在上学期间，而其阶层差距的强化主要发生在夏季(学校放假时，非学校因素就会发挥主要作用)。

6. 有多项研究探讨了公平就业机会(简称 EEO)法对机构产生的影响，但是目前仍然不清楚的是，被正式指控为犯有就业歧视并违反了公平就业机会法的企业，其针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工作环境是否得到了实质的改善。C. Elizabeth Hirsh 的《薄弱的执行力：歧视指控、法律环境和组织条件对工作场所隔离的影响》(The Strength of Weak Enforcement: The Impact of Discrimination Charges, Legal Environments, and Organizational Conditions on Workplace Segregation)一文在计算企业应对法律干预的经济和制度成本的基础上，评估了 1990 年至 2002 年期间，歧视指控以及企业改变性别和种族职业隔离的措施对工作场所隔离所产生的影响。作者通过使用一组与歧视指控数据相匹配的全国性企业随机抽样样本，研究了歧视指控对工作场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及企业的法律和组织环境对其产生的间接压力。对于性别职业隔离，作者发现企业并未因对他们的歧视职业指控而废除隔离，而是对在其生产领域和法律环境中执行公平就业机会法做出反应。对于种族隔离，组织因素而非法律干预是预测废除种族隔离的首选指标。作者认为，公平就业机会法主要通过企业的生产领域和法律环境中得以实施从而间接地促进了企业组织的改变。

7. Ryan D. King, Steven F. Messner 和 Robert D. Baller 的《当代仇恨犯罪、法律实施和种族暴力的遗产》(Contemporary Hate Crimes,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Legacy of Racial Violence)一文研究的是 1882 年至 1930 年间的私刑和当代美国应对仇恨犯罪的法律实施之间的关联。先前的研究显示过去私刑的程度和当前针对少数族裔的社会控制实践之间存在正相关，而作者对于保护

少数族裔的社会控制面向提出了相反的假设。具体的说，作者认为在 1930 年之前私刑更为泛滥的地区，对于仇恨犯罪的治理和检控并不会更加积极。分析显示，过去私刑的程度与对暴力犯罪治理和检控密切相关的三个结果变量相关，但是私刑的效果却部分取决于少数族裔当前所受的威胁，也就是说，涉及黑人的大量私刑压制了（1）警察执行联邦仇恨犯罪法，（2）警察报告针对黑人的仇恨犯罪，（3）以及在一些分析中，起诉仇恨犯罪案件的可能性。文章的结论对于在实践社会控制时的法律、族裔冲突和历史延续性的相关研究，以及强调少数族裔威胁的理论具有借鉴的意义。

8. 福利制裁是一种针对那些没有遵守福利项目规则的个人的经济制裁。这种制裁的普遍使用反映的是一种针对贫困管理的惩戒方法。在 Sanford F. Schram, Joe Soss, Richard C. Fording 和 Linda Houser 的《决定惩戒：处在福利改革前线的种族、选择和惩罚》（*Deciding to Discipline: Race, Choice, and Punishment at the Frontlines of Welfare Reform*）一文中，作者探讨了暗含的种族偏见和不良的信誉记录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型塑了政府官员加强制裁的决定。文章作者基于假设情境提出了经验性证据，即当拉美裔、非洲裔和白人顾客都有不良信誉记录时，个案管理者更倾向于对拉美裔和黑人顾客、而非白人顾客实施制裁。作者运用三角交叉检视法（triangulate）检验了通过分析国家行政数据而得出的结论。数据分析结果对于拉美裔是不确定的，但是对于黑人却获得一致的证据，即当同时具有不良信誉记录时，黑人被制裁的可能性远远高于白人顾客。总而言之，文章阐明了在新的惩戒性福利条例中，少数族裔，尤其是非洲裔美国人，如何更有可能由于其偏差行为而被惩罚。

9. 社会科学家通常试图根据经济、社会结构或贫困文化等理论解释与福利相关的行为。然而，这样的解释并不能说明接受公共援助的墨西哥裔移民其福利行为的差异。《解释墨西哥移民的福利行为：就业文化行为套路的重要性》（*Explaining Mexican-Immigrant Welfare Behaviors: The Importance of Employment-Related Cultural Repertoires*）一文建立了一种唯物主义的文化行为套路解释，并提出了相关假设来解释墨西哥裔移民的福利行为。文章作者 Jennifer Van Hook 和 Frank D. Bean 认为墨西哥裔移民来到美国，并在具有既定的就业文化行为套路的环境中工作，与在本土出生人的或其他移民群体相比，并不被鼓励更多地参与福利，（部分原因是这类行为将更快地导致福利消减）以及参与更多具有后期福利的职业，这在福利政策相对更为慷慨的州尤为明显。文章通过使用早于福利改革法案（*Welfare Reform Act*）的个体层次的数据，该数据来自于美国收入与项目参与调查（SIPP）并结合了国家层面的关于福利水平的相关资料，探讨了随着福利标准的改变，移民群体在福利接受、保留和将其转变为不同类型职业等方面存在的差异。研究结论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行为套路假设一致：墨西哥裔移民倾向于利用福利项目，并不是为了逃避劳动或应付不利条件或保存文化独立性，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职业不稳定性的影响，这一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10. 社会学家对于集体记忆的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视角以及对此的新解读。过去是如何塑造出当前的个人和团体的？过去又是如何被用来创造今天的发展的？种族是当前的重要话题之一，它表明了美国的过去对今天的种族关系如何产生影响。对于种族压迫、冲突记忆的重建是在如何塑造今天的种族关系？审视这些非常重要。但是，种族关系研究常常会忽略集体记忆在种族规范和种族态度的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些记忆有什么作用？公民权力记忆与种族态度》（*What Do These Memories Do? Civil Rights Remembrance and Racial Attitudes*）一文收集了 1993 年的社会普查数据，审视了美国人人权运动的记忆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种族态度和种族优惠政策形成的，并且讨论了集体记忆和种族关系文献中的“沉默现象”。虽然文章作者 Larry J. Griffin 和 Kenneth A. Bollen 发现美国人对针对美国黑人的一些政府项目的观点和人权议题缺乏记忆，但相比那些拥有其他记忆的人们来说，那些能够立刻回忆起人权运动并把人权运动的胜利视为特

别重要历史事件的人表达了比较自由的种族观点。文章的研究结果支持了集体记忆研究中的基本前提，即集体记忆至关重要，并且指出这是种族态度研究中一项卓有成效的新方法。

11. 《对移民的官僚政治吸纳：专业使命和政府的双重性》(Immigrant Bureaucratic Incorporation: The Dual of Professional Missions and Government)一文在借鉴以往定性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在实行美国“新移民目标”的农村，当地人和各类机构是如何适应新的西班牙语裔移民，并分析是否应该将它们互动视为实质性的反应行为。相对于传统政治吸纳理论 (political incorporation theories) 所作的预测，也基于半结构性访谈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结论，作者 Helen B. Marrow 认为西班牙语裔新移民正在经历由公共服务官僚、而不是民选政治家主导的官僚政治吸纳过程，即开始实了实质性的反应过程。最后，作者在更为综合的关于人口需求、选举机构和公共官僚机构的社会学视角下得出上述研究结论。

12. 以往的研究认为应将美国少数族裔加入工会视为经济吸纳过程的一部分。然而，几乎没有任何研究探讨在工会衰落的近几十年，这种研究模式是否仍然对美国最大的少数族裔群体 (西班牙语裔) 有效。《美国的西班牙语裔和工会工人，1973 年至 2007 年》(Hispanics and Organized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3 to 2007) 一文作者 Jake Rosenfeld 和 Meredith Kleykamp 在罗列了传统劳动力市场理论并结合社会连带主义 (solidaristic) 假设的基础上，通过使用 1973 年至 2007 年美国当前人口普查 (CPS) 的数据，提供了一种较为综合的研究美国的西班牙语裔和工会工人的分析视角。作者以公民身份、国籍和进入美国的时间等因素来分析西班牙语裔人口，从而揭示了工会成员中亚群体人口的差异。该研究进一步利用 CPS 的结构数据，以加入工会的个体作为单位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工会吸纳新移民的努力是否可以导致可见的收益。与劳工组织社会连带主义的假设一致，研究结论认为特定的西班牙语裔亚群体，特别是那些在美国出生和获得公民身份的西班牙语裔倾向于更程度的联合，而且他们参加工会的比率高于美国本土出生的白人。然而，其它因素如部门、职业和公司规模等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变量表明，工会复兴不能仅仅依靠某一个群体发挥集体行动的能力。

除以上 12 篇被归类为“种族/族群研究”之外，被分别归类于“教育研究”和“社会暴力研究”的另外两篇论文也与种族/族群研究密切相关，在这里也作一个简略介绍。

第一篇是 Robert Crosnoe 的《低收入家庭学生与公立高中的社会经济构成》(Low-Income Students and the Socioeconomic Composition of Public High Schools)，该文将“倾向数值分析” (propensity score analyses) 和强健性计算 (robustness calculations) 引入“青少年健康国家跟踪研究项目”中以公立高中为案例的研究。对于多种族学校的研究已开始关注如何消除各种族间的社会经济隔离，尽管过去的研究显示消除种族间的社会经济隔离有助于提高学业成绩，但是从“青蛙池塘”理论视角来看，在低学业成就的学生中，取消社会经济隔离可能存在潜在危险。文章认为随着中高收入家庭学生比例的增加，低收入家庭学生在数学和自然科学上的成绩进步减弱。此外，随着中高收入家庭学生、或受过高等教育家庭学生比例的增加，低收入家庭学生可能会经历更多的社会心理问题。这种模式在黑人家庭和拉美裔家庭的学生中往往更明显，研究结果建议社会应该经常关注学校教育中的青蛙池塘效应。

另外一篇是 Andrew W. Martin, John D. McCarthy, 和 Clark McPhail 的《为什么目标重要：对集体暴力行为的一种更宽泛的研究》(Why Targets Matter: Toward a More Inclusive Model of Collective Violence)，该文试图通过探讨暴力行为的目标来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理论和分析框架。虽然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但其国内依然存在大量社会问题和矛盾，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集体暴力成为当代美国一个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美国以往对集体暴力的研究者更注重对一系列个体事件的分析，因此建立统一研究模型的种种努力受到了限制。作者认为通过考虑“谁”或“什么”会成为暴力事件中针对的目标，并综合群体事件的规模和其可能发挥的假定作用，来提供一种可以洞察集体暴力动力学的新理论。作者分析了报纸上不同类型的集体事件 (从聚会、集会到



暴乱),发现在许多情景中,集体规模的大小会增加对一些目标(如明显的国家行为者如官员、警察)发生暴力行为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可降低对其他目标发生暴力行为的机率。为什么解读“目标”对于理解集体暴力动力学至关重要?这一研究结论为今后在这一方向上开展更为广泛的探讨提供了一个基础。

### 三. 社会力量 (Social Forces, 13 篇)

1. 密苏里州立大学 (Missouri State University) 的 Tricia McTague、维吉尼亚理工学院和州立大学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的 Kevin Stainback 以及马萨诸塞大学阿姆赫斯特分校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Amherst) 的 Donal Tomaskovic-Devey 合作的文章《从组织视角理解美国工作场合的性别和种族隔离》(An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ing Sex and Race Segregation in US Workplaces) 主要关注私营企业工作场所的种族和性别隔离。作者采用了美国平等雇佣机会委员会收集的 1966 年到 2000 年的数据。作者指出,性别隔离尚未被制度化,然而种族隔离却日益走向制度化,虽然在 1980 年后稍有缓和。该研究揭示了组织场 (organizational fields) 和劳动力队列 (labor queues) 对于维持和改变工作场合不平等的重要性。

2. 纽约大学 (New York University) Ann Morning 的文章《走向 21 世纪种族概念化社会学》(Toward a Sociology of Racial Conceptualization for the 21<sup>st</sup> Century) 主要关注种族的**概念化**过程。作者基于经验的、方法论的以及理论的考虑拟写了一个关于种族概念化的研究计划。作者访谈了 50 多名大学生,描述了不同受访者对于**种族**概念的理解,指出用概念化多重测量方法的重要性,展示出概念化的可变性,并将其与人口背景联系起来。由此作者提出了在变动的 21 世纪中种族概念化的演变问题。

3. 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ilwaukee) 的 Pat Rubio Goldsmith 的文章《学校,邻里社区还是两者兼有? 种族和族群区隔和教育获得》(Schools or Neighborhoods or both? Race and Ethnic Segregation and Educational Attainment) 关注学校和邻里社区两个场景中种族和族群区隔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作者采用全国教育统计中心的纵向数据,探讨是否高中阶段邻里社区或者学校的黑人和拉丁美洲人比例会影响人们直至 26 岁的教育获得。作者发现,学校而非邻里社区黑人以及拉丁美洲人的高度集中,从长远来看,与低教育获得有相关关系。

4. 宾夕法尼亚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的 Virginia W. Chang、Amy E. Hillier 和 Neil K. Mehta 的文章《邻里社区的种族隔离、身心失调和肥胖》(Neighborhood Racial Isolation, Disorder and Obesity) 主要关注种族隔离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以费城为例,作者发现,黑人密集居住社区里的女性有较高的身体体型指数和较高的肥胖比例,然而,男性没有显示出显著差异。这显示出在邻里社区结构对健康影响方面存在着性别差异。

5. 维拉诺瓦大学 (Villanova University) 的 Robert DeFina 和 Lance Hannon 的文章《多元化、种族威胁和大城市的居住区隔》(Diversity, Racial Threat and Metropolitan Housing Segregation) 的文章主要关注居住区隔与种族威胁之间的关系。作者采用 1990 年和 2000 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大城市地区的黑人-白人以及西班牙裔-白人居住区隔模型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种族威胁效应在族群成分多元化的地域大为减小。

6. 犹他大学 (University of Utah) 的 Ming Wen、芝加哥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ago) 的 Diane S. Lauderdale 以及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的 Namratha R. Kandula 合作的文章《多族群美国的族群社区, 1990-2000: 少数族裔郊区的族群性复活?》(Ethnic Neighborhoods in Multi-Ethnic America, 1990-2000: Resurgent Ethnicity in the Ethnoburbs?) 主要关注族群隔离现象。研究数据来源于美国 1990 年和 2000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库。研究发现,对于大多数种族/族群群体来说,少数族群社区的数量以及比例从 1990 年到 2000 年有所增长,郊区城市化的趋势非常



明显。亚裔社区发展最快，少数族裔郊区已普及全国。尽管少数族裔郊区更多地是一个亚洲现象，但西班牙和黑人少数族裔郊区也开始发展。这种现象支持了区隔式融合模型（segmented assimilation model）以及族群性复活的观点。

7. 里哈伊大学（Lehigh University）的 Matthew R. Sanderson 和犹他大学的 Jeffrey D. Kentor 合作的文章《全球化、发展和国际移民：对次发达国家的跨国比较，1970-2000》（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Cross-national Analysis of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1970-2000）主要关注国际移民与全球化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作者采用一组次发达国家从1970年到2000年的数据，提出了三个核心发现：首先，国外直接投资对于不同的经济部分有显著的且不尽相同的影响：国外直接投资在第一产业增加了净移民率水平，然而国外投资在第二产业对移民率有阻碍效应；其次，经济发展对于净移民水平有显著的非线性的效应；最后，移民一旦开始，即有强大的内部惯性。

8. 多伦多大学和美国律师基金会（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American Bar Foundation）的 Ronit Dinovitzer、西北大学和美国律师基金会的 John Hagan 以及多伦多大学的 Ron Levi 合作的《一个全球边缘城市的移民和青少年违法》（Immigration and Youthful Illegalities in a Global Edge City）主要关注多伦多地区的移民和青少年违法。通过对两代人（1976,1999）两组青少年同期群的研究，作者阐述了一个可能影响青少年违法的多因素过程模型。

9. 乌特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的 Agnieszka Kanas 和 Frank Van Tubergen 合作的文章《输出国和接收国教育对移民经济能力的影响》（The Impact of Origin and Host Country Schooling on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Immigrants）主要关注教育投入分别在迁出国和接收国的经济回报。作者对荷兰境内的移民（包括土耳其人、摩洛哥人、苏里南人和安替列人）开展了大范围调查。研究发现，苏里南人和安替列人在输出国的教育投入，其经济回报比土耳其人和摩洛哥人要更高一些。研究同时说明，移民们在接收国进行的教育投入，其得到的经济回报要比在迁出国更大，而这种较大的经济回报与移民和当地人社会接触的增多或减少无关。

10. 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的 Jean Stockard 等人合作的文章《美国非婚生育率同期群效应的种族差异》（Race Differences in Cohort Effects on Non-marital Fert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研究的主要是美国社会 20-44 岁白人和黑人妇女的非婚生育率比较。作者主要关注三个同期群因素：家庭结构、入学和性别比。对于白人和黑人来说，拥有较少传统家庭结构的同期群（cohort）有较高的非婚生育率。对白人来说，入学对非婚生育率的影响产生的是负效应，而对黑人则产生正效应。性别比因素对黑人产生的是负效应，对白人则产生正效应。

11. 马里兰大学的 Steve Martin 的文章《评论：区分非婚生育率同期群效应和年龄、时间效应》对 Jean Stockard 等人合作的文章《美国非婚生育率同期群效应的种族差异》一文做出了评论。Martin 以非西班牙裔白人为例，认为年龄时间效应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比同期群效应更明显，同期群效应和非婚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很可能是一种偶然性关系。

12. 俄勒冈大学（University of Oregon）的 Jean Stockard 等人在《美国非婚生育率同期群效应的种族差异：对马丁的回应》（Race Differences in Cohort Effects on Non-marital Ferti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Reply to Martin）一文中对于 Martin 的质疑进行了回应。作者指出，Martin 提出的问题有助于澄清同期群效应的本质。作者对他们的数据进行重新检验之后，再次证明了他们研究结果的坚实性（robustness）。

13. 康涅狄格大学（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的 Simon Cheng 和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 Kathryn J. Lively 合作的文章《多种族的自我认同和青少年结果：从社会心理学路径看边缘人理论》（Multiracial Self-identification and Adolescent Outcome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Marginal Man Theory）主要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考察多种族身份青少年问题。通过对“边缘人”的社会心理学解读，作者假定，自我认同为多种族背景的青少年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心理困难，但同时会比单一种族背景的群体更积极地参与社会互动。作者同时借用“边缘人理论”对多种族青少年学校和行为结果进行假定。通过对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分析，经验材料证明

了“边缘人理论”提出的假定。

#### 四.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4 篇)

1. Frank van Tubergen和 Matthijs Kalmijn 所著《荷兰移民的语言精通与使用：鼓励因素还是时机问题？》(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Usage Among Im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 Incentives or Opportunities?) 检验了移民的语言精通程度与语言实际运用的决定因素，语言的这两个方面目前在文献中都是被分开讨论的。一个根本问题是：是相似的还是不同的模式导致了语言的这两个方面。数据来自大规模反复进行的截面调查，这一调查的对象是居住在荷兰的土耳其和摩洛哥移民。研究者关注移民们的荷兰语口语能力和与他人交谈时荷兰语的使用情况。研究结果显示，虽然口语能力和语言实际运用的水平几乎差不多，但他们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语言精通水平与语言的实际运用同样受到移民动机、移民目的、邻里间种族聚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与交谈对象的荷兰语使用情况直接且强烈的受到交谈对象荷兰语水平的影响。相比于对语言实际使用的影响，移民年龄和教育水平对于语言精通水平的影响更为重要。

2. Borja Martinovic, Frank van Tubergen 和 Ineke Maas 所著《种族交往动力学：荷兰移民的面板研究》(Dynamics of Interethnic Contact: A Panel Study of Immigrants in the Netherlands)。与先前静态的族际交往研究相比，这篇文章提供了一种动态研究方法。研究目的是通过相关的时间常数和时变因素来解释族际交往中的个体变化。研究者调查了这些因素在T1时刻和T2时刻之间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从而采用了因果关系的更好的评估方式。参数选择、外部时机和第三方影响的理论也被用作识别族际交往的潜在预测指标。研究者利用荷兰的土耳其、摩洛哥、苏里南和安替列移民的横向比较数据检验了理论假设。分析结果显示，静态研究可以很好地对时间常数因素进行评估，但是会高估时变因素的作用。并且，由于教育、语言熟练度、较低的移民聚集度、本地伴侣这些因素的作用，会明显地导致族际交往随着时间增加而加强，以上这些因素对于族际交往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分析变量。

3. Nathalie Rink, Karen Phaet 和 Marc Swyngedouw 所著《移民人口规模，失业人口及个人特点于 1991 年至 1999 年在佛兰德斯 Vlaams Blok 对选举的影响》(The Effects of Immigrant Population Size, Unemployment, and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on Voting for the Vlaams Blok in Flanders 1991-1999) 讨论了语境特点在排他反应中的效果。对于移民的态度可以解释那些直接影响选举行为的预测。在移民人口规模和失业率都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期望会有更多人投票支持反对移民的政党 Vlaams Blok。运用多级分析的方法（二元三级重复测量数据的逻辑回归），作者对 1991、1995、1999 年前后所涉及的各类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测试，同时也包括了个人性格和跨层次互动等变量。为此，研究者使用在佛兰德斯重复大选调查中由合并个体记录组成的固定数据样本，时间是 1991 年，1995 年及 1999 年（共计 3748 人），并增加了 175 个城镇的时间变量数据。正如所料，移民人口的规模增加了市民为 Vlaams Blok 投票的可能性，这一效果呈曲线趋势。但是，失业率水平并不能解释给 Vlaams Blok 投票的行为差异。就个人情况而言，拥有较低职位和失业的人更倾向投票给 Vlaams Blok。此外，一个明显的跨层次互动表明，在受到较高教育的人群中，支持 Vlaams Blok 选举的移民比例显著降低。最后，移民人口规模的非线性条件作用随着时间推移被完全复制。

4. Moshe Semyonov 和 Anya Glikman 所著《族群居住隔离、社会交往及欧洲反少数族群态度》(Ethnic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Social Contacts, and Anti-Minority Attitudes in European Societies) 一文指出，长期以来族群居住隔离一直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结构性机制，在此机制下，少数族裔被剥夺了平等的机会、奖励和社会设施。族群居住隔离也大大减少了少数族群与多数群体成员的社会联系及发展社会交往的机会。本文探讨了欧洲社会族群居住隔离、族群之间的社会交往、对少数族群态度这几种现象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本文特别研究了以下几种假设：第一，族群居住隔离（即全欧洲的每一个地方的同类聚居）限制了建立和发展族群间社会交往的机会；第二，积极

的族群间的交往可能会减少反少数民族态度产生的机会（即对威胁和社会隔离的看法）；第三，社会交往调节少数民族与邻里的关系及反少数民族的态度。本文使用了2003年以来欧洲社会调查对21个欧洲国家的多层次回归模型系列调研的数据，研究跨国之间比较框架的假设。虽然调查结果普遍支持预期的理论，但也强调族群居住隔离确实影响着族群交往中对少数民族的态度。

## 结束语

从以上4种杂志发表的38篇论文来看，社会学在族群/种族研究领域的主题在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中越来越多元化，而且和跨国迁移与国内迁移密切联系在一起。

在这些论文中，涉及的最集中的主题是三个，一个是居住隔离，一个是就业中的不平等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受教育机会。这三个领域可以说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种族-族群问题的传统专题，而且相互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由于在不同种族人口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或族群分层，一些种族的大多数成员属于社会的中上层或白领阶层，另一些种族的大多数成员属于社会下层或蓝领阶层。同时，在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方面的显著差距使得不同种族的主体人口分别居住在不同的社区，而低收入社区中的学校通常经费短缺、教学质量也比较低。这样，居住格局对各族群下一代的受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机会造成显著影响，并进一步体现在下一代成员在就业方面的不平等和收入差距。所以，社会学家们长期以来始终将调查和研究族群关系的主要注意力放在居住格局、受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不平等方面。

除此之外，关于“民族”概念和族群记忆的讨论、语言差异、族群心理、族群生育行为差异、移民社区与族群关系、商贸企业职员多族群性对企业销售业绩的影响等专题，也都在2009年这四个杂志发表论文的涵盖范围中。在全球化和劳动力跨国迁移的社会发展态势下，几乎所有的国家和社会不仅出现族群矛盾和族际冲突，而且在金融危机、经济萧条的大形势下，这些族际矛盾还呈现了进一步不断恶化的趋势，因此，族群关系和族群冲突就更加需要社会学家的关注。特别是在那些统一的国家公民意识尚未完全建立、各族群的群体政治意识依然很强的国家里，“民族构建”（nation building）的现代过程尚未完成，国家的凝聚力尚未发展并真正巩固。在这样的国家中，各类资源和发展机会的分配矛盾很容易导致以族群为单元的群体冲突，加上境外相同宗教、相同血缘、相同语言群体势力的介入，会使本来已经十分复杂的社会矛盾雪上加霜。欧洲国家和美国在处理这些矛盾时提出的思路和采用的具体措施，都值得21世纪的中国人借鉴。

需要说明的是，这4种学术期刊的作者和读者主要来自西方工业化社会，他们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他们的研究对象也是西方社会，而中国由于有自己的悠久历史和独特国情，在借鉴这些研究成果时肯定存在着明显的国情差距。但是这一点并不应当妨碍我们从阅读这些论文中吸取经验、知识和智慧。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既存在许许多多的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上的“异”，同时也存在科技发展规律、市场运行机制上的“同”。每个国家的社会发展，都是在与历史的纵向比较和其他国家经验的横向比较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而得以前进的。

本文选择的这4种期刊是社会学世界级学术杂志，代表了国际社会学界（主要是美国与欧洲）的学术关注和研究进展，对于国内学者和研究生了解社会学学科的发展概貌和动态十分必要。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发表的对中国社会问题进行研究的论文极少，无法满足那些更关心国外的中国研究的读者。对于那些希望更多了解国外中国研究成果的读者，我们建议阅读“地域研究”杂志（如《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或者“专题研究”杂志（如《亚洲族群》*Asian Ethnicity*）等来补充更加具体的关于中国社会的专题研究信息。这样我们的知识就会更加全面和充实。